

北师人 BFSU

ALUMNI MAGAZINE

2018年9月刊 总第24期

鹿泽亭

吾爱吾师
育人，育己
——访体育教研部南征教授

校友风采
墨过痕留却无声
——访马振岗校友

彩笺挥翰
从延安到联合国
赴萨摩亚建馆的日子

September 2018



2018年9月刊 总第24期

主 管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 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友工作办公室
承 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友交流中心
《北外人》编辑部
顾 问 王定华 彭 龙

编审委员会

主 编 闫国华
副主编 刘博然 蔡芝芳
吴 浩
编 审 周 静 郭 晓
姚 雪

文字编辑

曹思涵 杨宇凡 李 念
龚欣煜 王雨轩 王 楠

美术编辑

王 欣 肖 雨

§ 母校动态

§ 校友动向

§ 吾爱吾师

P18 促管理学科大发展 纳四方英才来北外
——访国际商学院教授、人事处处长张继红

P20 育人，育己
——访体育教研部南征教授

§ 校友风采

P25 墨过痕留却无声
——访马振岗校友

P35 一路兼程，一路花雨
——访邵俊阳校友

P37 人生就是要突破自己，影响更多人
——访张莉校友

P39 归来仍是少年
——访徐喆校友

§ 彩笺挥翰

P41 从延安到联合国

P57 赴萨摩亚建馆的日子

P60 丹麦绿色发展模式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节约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P64 岁杪晤在京北外校友感赋

§ 回馈母校

§ 征稿启事

我校获批新增 18 个本科专业，开设外语语种数量达到 98 个

2018 年 3 月，教育部公布了 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校申报的迪维希语、德顿语、达里语、卢旺达语、塞苏陀语、隆迪语、切瓦语、桑戈语、斐济语、皮金语、纽埃语、比斯拉马语、库克群岛毛利语、卢森堡语、世界史、财务管理、国际商务、戏剧学等 18 个本科专业正式通过教育部评议予以设立。

至此，我校本科专业增至 115 个，其中外语专业 97 个，开设语种达到 98 个，翻译专业 1 个，非外语专业 17 个。

近年来，在教育部支持下，我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亟需，持续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基本开齐 175 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预计到 2020 年，我校开设语种数量将突破 100 个。

我校新增学位授权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教育部发布《关于下达 2017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公布了 2017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我校新增学位授权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学校新增 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新增 3 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增 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法律、新闻与传播、会计。经过本轮增列，我校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2 个（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 9 个（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点 7 个（金融、国际商务、汉语国际教育、翻译、新闻与传播、法律、会计），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四大学科门类，学科布局进一步丰富。

荷兰王国首相马克·吕特访问我校



2018年4月12日，荷兰王国首相马克·吕特访问我校。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荷兰总务部总秘书长保尔·霍耶慈、荷兰外交政策和国防顾问大卫·范·维尔、荷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鄱佩德等陪同来访。

校长彭龙在图书馆举行仪式欢迎吕特来访，中国驻荷兰大使吴恳出席欢迎仪式。彭龙简要介绍了北外，特别是荷兰语专业的发展建设情况。北外的荷兰语专业不仅是中国培养荷兰语人才的最主要基地，同时也正在成为从事荷兰研究、传播荷兰文化的重要平台。吕特高度评价了我校荷兰语专业学生的语言水平，感谢北外在培养荷兰语专业人才、传播荷兰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在吕特的见证下，彭龙与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共同为北外荷兰研究中心成立揭牌。

伊莎白教授、马克林教授获评“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

2018年4月，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举行，会议揭晓了“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我校外国专家伊莎白教授和马克林教授获此殊荣。

伊莎白（加拿大）和她的丈夫柯鲁克自1948年开始从事外语教学工作，一直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马克林（澳大利亚），澳中关系和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从1964年第一次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开始，马克林60多次访华，孜孜不倦地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于1966年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澳洲大学中第一个中国研究中心。



我校德国专家顾彬教授当选 2017 “外教中国” 年度人物



2018年5月24日，由国家外国专家局举办的枫叶杯第七届“我与外教”全国大赛颁奖典礼暨第六届“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我校德国专家顾彬教授当选2017“外教中国”年度人物。

顾彬教授于2011年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先后在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及历史学院担任科研教学工作。顾彬教授是欧洲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及思想史，对中国文化有着数十年的研究经验，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揭牌仪式和发展论坛举行

2018年5月2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揭牌仪式和发展论坛在我校举行。

北外正在形成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工、教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在国际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的重大发展机遇到来之际，北外国际教育学院应运而生。以2015年设立教育学院为基础，今年4月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将教育学院更名为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将以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多元化为发展特征，把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和教育法律政策列为教学科研的重点领域，凝聚力量，突出优势，重点发展，特色推进。

揭牌仪式上，王定华、彭龙、瞿振元、秦惠民共同为新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揭牌。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由秦惠民担任。



《人民日报》刊登王定华书记文章：《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推进“双一流”建设》

2018年5月30日,《人民日报》第12版综合版刊登我校党委书记王定华教授的文章:《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推进“双一流”建设》。

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论述,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全局出发,对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作出的深刻把握,为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根本遵循。文章围绕如何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推进“双一流”建设这一主题,从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要义、方位坐标、实践路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应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冰岛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冰语言文化教学研讨会举行

2018年6月4日,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冰岛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校长彭龙,冰岛驻华大使古士贤,中国驻冰岛前大使王荣华、张卫东出席成立仪式,冰岛大学多语种教师代表团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和中冰语言文化教学研讨会。

彭龙和古士贤共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冰岛研究中心揭牌。



我校学生在第七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全国总决赛取得佳绩



2018年6月23至24日，第七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我校学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再创佳绩，包揽交传组冠亚季军，获得同传组冠军和季军，高级翻译学院孙婷婷老师、陈可老师，英语学院王颖冲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导师任文教授应邀担任大赛评委。

在6月23日举行的交传晋级赛中，高级翻译学院研一学生连晨佳夺冠，英语学院翻译系大四学生崔心仪获得亚军，高级翻译学院研一学生崔恩侨获得季军。

在本届大赛的同传组比赛当中，高级翻译学院研二学生祁天、英语学院MTI口译专业研二学生侯博雅发挥稳定，分获冠军和季军。

教育部授予我校陈琳教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018年8月，教育部面向全国下发了《教育部关于授予陈琳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决定》（教师[2018]8号），授予我校陈琳教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外语教育专家。兼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会员、国家语委外语中文译写规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曾获全国科教兴国贡献奖、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等。



北外校友篮球协会外交部分会校友和教职工篮球友谊赛举行



2018年4月1日上午9:30,北外校友篮球协会外交部分会校友和教职工篮球友谊赛在学校体育馆二层篮球场举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角逐,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次比赛增进了校友与母校的感情,加强了校友与教职工及在校生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校友工作的发展和进步。中午12:00,篮球赛圆满结束。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美校友会 2018 年第一次理事会视频会议召开

2018年4月9日上午9点(北京时间)我校北美校友会2018年第一次理事会视频会议顺利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北外北美校友会会长王锐、北外北美校友会和北外美中文化交流协会董事长刘红、我校校友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博然及北美校友会理事会成员:黄慧、曲素会、王锐、何毅、孟涛、罗丹、徐解颐、薛青等。

会议伊始,北美校友会会长王锐回顾了2017年度北美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和各地区校友分会的工作成果,并对2018年北美校友会的发展方向做了规划。

刘博然向出席此次会议的理事会成员介绍了今年母校校庆的活动计划,并诚挚邀请北美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回校参加母校77周年校庆日活动。

黄慧校友向理事会成员汇报了北美校友会的财务运转状况。黄慧指出,2018年北美校友会将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其中包括颁布财务章程,公布每年度财务状况,并与理事会成员共同探讨了北美校

友们如何通过合法方式向母校进行捐赠。

北外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红详细介绍了北外美中交流协会未来的活动开展设想,例如举办图书展览,名人讲座等。刘红还向大家汇报了协会的财务状况。

理事会成员何毅校友就联络校友的方式做了进一步探讨。他提议,分散在北美各地区的校友可以借助出游、学习等机会联络当地校友,充分利用校友平台扩展校友之间的联络空间,更好地凝聚校友力量。

王锐会长做会议总结发言,并明确提出了2018年北美校友会捐赠母校的计划。此次会议还确定了各个分会的负责人并公布了联系方式。

通过此次视频会议,北外北美校友会的各理事会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很多有助于北美校友会持续发展的建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一周年庆典暨《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6-2017）》悉尼发布会举行



2018年4月1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一周年庆典暨《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6-2017）》悉尼发布会在澳大利亚悉尼绿地铂瑞酒店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教育参赞牛文起、中国银行澳大利亚地区行长兼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怀宇、中国高校在澳校友会的代表等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了大会。

出席的校友和嘉宾观看了去年四月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的视频和照片，共同回顾了校友会成立的情景。主持人汪震校友带大家重温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致北外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的贺信。

校长彭龙向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一周年庆典发来贺信，他肯定澳大利亚校友会一年来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高度赞扬了校友会在加强母校与澳洲及南太平洋地区的联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在澳校友群策群力，与母校共同进步。孙有中在致辞中介绍了过去一年北外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北外开设的外语语种已达到98个，本科专业增至115个。北外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

牛文起高度赞扬了北外澳大利亚校友为研究和推动中澳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期待校友会能团结澳洲校友，促进中澳文化交流。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刘勉通过视频问候在场的北外校友和嘉宾，并对澳大利亚校友会的发展表达了美好祝愿。

孙有中向陈怀宇颁发了彭龙校长签字的名誉会长委任状。陈怀宇感谢彭龙校长的信任，表示将全力支持校友会和母校的建设。澳大利亚校友会秘书长张文彬向各位校友和嘉宾汇报了澳大利亚校友会在新的一年里的计划和展望，包括建立区域分会和行业分会，团结和发展非华人校友，组织高质量的专题活动和论坛等，最终把校友会建设成为连接母校和澳大利亚的桥梁，回馈母校发展。

随后进行的《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6-2017）》悉尼发布会由我校英语学院院长张剑主持。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澳大利亚蓝皮书》主编孙有中详细介绍了蓝皮书的内容，并向悉尼教育总领馆教育组、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等单位赠书。这也是《澳大利亚蓝皮书》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举行发布会。

张志勇校友受邀在我校做“国际税收的多边发展进程”主题报告



2018年4月18日，2018校友讲坛第一讲暨本学期“形势与政策”报告第二讲举行。英语学院1977级校友、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张志勇就“国际税收的多边发展进程”做主旨报告。报告会由副校长闫国华主持。

报告由“国际税收的单边与双边规则”“新多边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两部分组成。张志勇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和深厚的背景知识储备，详细介绍了国际税收多边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成就与挑战。

张志勇表示，尽管面临着全球数字经济、个别地区及领域单边主义抬头等挑战，但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多边主义仍然是主流的、不可逆的发展趋势。报告最后，在场学生就国际避税港治理等问题提问，张志勇进行了细致解答。

鲁桂成大使回校做“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的讲座



2018年4月25日，校友讲坛暨“形式与政策”报告之三举行，鲁桂成大使回校做了题为“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的报告。

鲁桂成大使在讲座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进

行了讲述，分析了其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在不同阶段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主要事件，从侵华战争中两国的战友情谊到冷战时期中国受到的孤立和封锁，从2008年奥运会中国在国际舞台获得瞩目，在新世纪综合国力的飞速增强，到现今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博弈。鲁桂成大使结合十九大内容，强调中国应当在新时代追求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

之后，鲁桂成大使解答了同学们关于现阶段中国外交与发展的诸多问题，交流氛围轻松而愉快。鲁桂成大使用生动形象、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激情澎湃的讲演赢得同学们多次热情澎湃的掌声。

鲁桂成，我校俄语学院1971级校友，曾任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驻白俄罗斯大使，外交部档案馆馆长。

我校校友、国际劳工组织前资深外交官张幼云应邀来校作报告

2018年4月25日，北外学院“走进国际组织”讲座第三讲举行，讲座由北外学院和国际组织学院共同举办。我校校友、国际劳工组织前资深外交官、劳动部原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幼云以“紧抓时代机遇，勇担国际使命——国际组织任职经验分享”为题，为师生带来精彩讲座。

再次回到母校，张幼云非常激动，她回忆起北外的校歌，动情地表达了对母校和恩师的感恩之情，并将自己在北外的收获总结为“家国情怀、语言本领和治学态度”。

张幼云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谈判的全部翻译工作，她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分享了自己参与翻译工作的经历，详细介绍了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各种艰辛。在讲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历时，张幼云围绕其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特别顾问以及首任性别平等局局长的任职经验，结合国际组织实习生案例等具体内容，

阐述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公务员所需的基本能力素养，以及如何为从事国际公务员做好各项准备。

张幼云勉励同学们要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同伟大的愿景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拥有持久的动力以及开阔的心胸和视野。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充满艰辛，但认准的事就要脚踏实地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用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处细节，不执着于最后的成就，而关注追梦过程中的幸福。

张幼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曾就职于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1982年9月，参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翻译工作。在1983年7月12日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的22轮会谈中，张幼云参与了全部翻译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特别顾问”，首任性别平等局局长，拥有极其丰富的外事工作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

我校师生祭奠校友英烈



2018年5月8日，为了纪念在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北外校友邵云环、许杏虎，及许杏虎的妻子朱颖三位记者，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赴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他们分别在邵云环、许杏虎夫妇烈士墓前三鞠躬，并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学生代表柳秦安琦在烈士墓前诵读了用英语写给烈士的祭文，寄托哀思，激励生者，祈求和平。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狂轰滥炸，5月7日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夫妇不幸牺牲。

我校校友、雷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冰捐资重建足球场



2018年5月10日，校长彭龙、副校长贾德忠与我校校友、雷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冰就其捐资重新铺设足球场人工草皮项目进行会谈。

彭龙高度赞扬了何冰校友的慷慨捐赠，感谢他心系母校，关注母校、回馈母校，他表示，重新铺设足球场人工草皮将提高学校师生员工的运动条件。彭龙对项目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校内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项目施工。

何冰表示，此次捐赠是为了感恩母校对他的培养，一定保质保量并按时完成施工。何冰从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监理、施工期限、后勤保障、垃圾清运和后期草坪养护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

何冰系我校1994级亚非学院校友，现任雷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是我校校友足球协会负责人之一。作为我校第一届校足球队队员，多年来持续对我校学生足球队给予捐赠支持。

《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访问我校



2018年5月11日，我校校友、《参考消息》报社张铁柱总编辑访问我校。

彭龙校长介绍了我校近年来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在语种建设方面，北外目前已开设98个外语语种，到2020年开设语种将

超过100个，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在人才培养方面，北外围绕国家战略亟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交叉培养、联合培养等。

张铁柱介绍了《参考消息》的基本情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参考消息》是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和中央授权独家转载境外媒体的报纸，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扩大《参考消息》在年轻读者中的影响，报社将向我校每天赠送500份报纸，让更多读者阅读有质量的精品新闻内容，推动北外人才培养。

张铁柱是我校俄语学院1978级校友，熟悉北外的生源质量、办学质量以及毕业生质量。他对北外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发展的战略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肯定，认为符合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北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校友队与校羽毛球队进行首次羽毛球友谊交流赛



2018年5月14日，在校友办、体育教研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共同协作下，北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校友羽毛球队莅临学校，与校羽毛球队进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羽毛球友谊交流赛。双方进行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共16场比赛，双方实力相当，对抗激烈，比赛十分精彩，最终以8:8平分秋色。此次比赛是北外羽毛球运动的第一次校友交流活动，友谊赛为在校生与校友之间搭建了非常好的沟通桥梁，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增进了友谊，提高了球技，共同进步。赛后，双方互赠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希望热爱羽毛球运动的校友与校友办取得联系，我们将竭力为大家组织更进一步的校友活动。

留苏预备部 1959 级校友联谊会举行



2018年5月15日，我校留苏预备部1959级校友联谊会在图书馆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姜颖等80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校友重回母校，畅叙同学情谊，感恩母校培养。

副校长闫国华出席联谊会，对各位老校友们重

回母校表示热烈欢迎，他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园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欢迎校友们有空常回来看看。

校友们介绍了各自近年来工作、生活的情况，他们都曾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中有政界、媒体界、企业界等各界楷模，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如今，他们大多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还在继续发挥余热。今天在母校又共聚一堂，都感到分外亲切和温暖。校友们回忆往昔，集体合唱了在母校求学时所学的苏联歌曲，场面温馨而热烈，将联谊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952年3月，我校留苏预备部成立，专门负责赴苏联人员的俄语培训，他们通常在学校学习一年后被派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其先进的经验和技能，回国后为建设祖国奉献力量。1960年下半年停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江苏校友会成立大会举行

北外江苏校友会 揭牌仪式



2018年5月1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江苏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南京紫金山庄举行。校长彭龙，副校长闫国华，我校原党委书记、校友总会会长杨学义，学校校董、广东顺德莱雅化工董事长梁志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兄弟高校，江苏优质生源基地校，在苏合作企业等各界人士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近200名在苏校友汇聚一堂，共同见证江苏校友会成立盛况。大会由我校校友刘帆、杨亚主持。

彭龙对北外江苏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在苏校友们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园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校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他表示，多年来北外一直坚持“外、特、精”办学理念，研究和传播中外优秀文化，致力于成为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引领者、服务国家全球战略的智库和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基地。北外积极服务国家战略，肩负“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要使命，目前学校共有98个语种，到2020年将开设超过100个语种，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和国别研究的全覆盖，是中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大学。学校推进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培养，为国家输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情怀的高质量人才。彭龙指出，江苏校友会要凝聚在苏校友力量，不仅为江苏省的发展做出贡献，也要参与到学校的发展建设中来，有空常回母校看看。

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保平对北外江苏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表示，东南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希望今后北外及其在苏校友与东南大学加强沟通交流，促进合作发展。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朱征表示，南京外国语学校秉承“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和“培育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的现代人”的培养目标，已为北外输送过以朱邦造、钟建华、孙宁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校友，希望今后以北外江苏校友会为纽带，加强与北外联系，并输送更多优质生源。福中集团副总裁陈洪表示，福中集团是一家以IT产业起家，构建“大电商、大健康、大金融、大地产、智慧城市”五大产业版块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北外与福中集团业已开启了校企合作之路，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入合作，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实现北外、企业、校友三方共赢的局面。

筹备组组长、外研社华东信息中心主任王建平介绍了江苏校友会的筹备情况。他表示，母校的大力支持，筹备人员努力工作，广大校友鼎力相助，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江苏校友会的成立。未来，江苏校友会要成为江苏校友的精神家园、校友互动的沟通平台和联系母校的桥梁纽带。

大会通过了北外江苏校友会任职人选。秦祖祥当选会长，王建平当选秘书长，刘帆当选副秘书长。理事会全体成员上台与校友们见面。

秦祖祥表示，江苏校友会将积极搭建母校与江苏省各界合作的桥梁，服务江苏省和母校的发展，达到共赢。未来，江苏校友会要进一步凝聚校友力量，支持母校建设和发展。在苏校友将彼此关心与支持，争做有胆识、有理想、有作为的北外人，不辜负母校的培养与期望。

北外上海校友会会长程慧玲表示，作为兄弟校友会的代表，她对江苏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上海校友会保持活力的工作经验。她希望今后

苏沪两地校友加强交流，共同推进北外地方校友会的建设与发展。

在校友们的见证下，北外校友总会会长杨学义与江苏校友会会长秦祖祥共同为北外江苏校友会揭牌。

北外校友总会副会长、副校长闫国华做总结发言。他表示，北外校友的足迹遍布全球，江苏校友会是母校成立的第30个校友分会。校友会是搭建校友与母校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心灵桥梁，希望江苏校友会依照“以感情交流为纽带、以开展活动为载体”的指导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真正建成“校友之家”。

成立仪式在校友们集体合唱校歌《永远为人民服务》中落下帷幕。随后举行了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北外·江苏”圆桌对话会。

对话会以“传承北外 荟聚江苏 不忘初心 共话宏图”为主题，校领导、学校职能部门代表、与会嘉宾和校友们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江苏省外事翻译中心主任孙健、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夏炎、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季苏颖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合作，吸纳北外人才，服务地方发展。南通中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陈文辉就进一步深化北外和优秀生源基地校之间的合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以留苏预备部1952级陈敬咏、英语学院1973级曹建新、国际商学院2013级仇鸣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校友就在北外的学习经历和自己的人生感悟进行了深入交流，南京外国语学校保送生2018级严雨等同学也参与了对话会。校友们和校领导、职能部门代表提问互动，问题涉及北外学院与国际组织学院的成立宗旨和未来发展、公共外交、校友工作、校地合作、招生就业等方面。对话会场面温馨，气氛热烈，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了感情。

外研社党总支书记王芳，英语学院院长张剑，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学生处处长丁浩，招生办主任许晔，校友办副主任刘博然、蔡芝芳等参加了成立大会。

校友讲坛暨“形势与政策”报告会“‘一带一路’与北极”举行



2018年5月23日，校友讲坛暨“形势与政策”报告会“‘一带一路’与北极”在阿语楼国际会议厅举行。讲座由张卫东校友主讲。

张卫东非常感谢北外及附中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接着，他介绍了冰岛的情况，冰岛是一个冰与火共存的国家，风景秀丽，人口稀少，最开始无人居住，从海盗定居后开始发展。冰岛的建筑风格多元化，包含世界各地的风格。自然风光方面，冰岛有广袤的苔原和因火山形成的地貌，张卫东展示了很多漂亮的冰岛风景图，令人神往。

随后，张卫东介绍了中国与冰岛的交往情况，两国1974年建交，九十年代两国交流开始迅速发展，自由贸易也随之不断推进，两国还致力于就地热资源的共同合作和开发。在教育方面，两国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张卫东充分肯定了北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谈到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理想，他介绍了相关国家诸如冰岛、俄罗斯等就此问题与我国的合作，中国和冰岛合作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冰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极与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极地区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博古采今的眼光。我国作为北极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态度共谋发展。

张卫东，我校英语学院1977级校友，曾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驻加拿大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挂职广东省外办副主任，驻冰岛特命全权大使。

我校校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应邀来校作讲座



2018年5月23日，由北外学院、国际组织学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走进国际组织”系列讲座在图书馆举行。我校校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作了题为“中国与联合国”的讲座。

陈健结合在联合国工作的经历，运用翔实的数据和资料，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他从时代性质与特点的变化、联合国性质与作用的变化、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三个变化入手，揭开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历史。

陈健对向往成为国际公务员的同学们提出了“用英语及国际语言思维，用联合国的方式开展实践”的期望，鼓励大家投身于国际组织工作，为国际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陈健，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驻日大使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是华人在联合国担任过最高职位的官员，具有丰富的外事工作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

北外校友定向越野活动举行

2018年6月2日，北外校友运动会第六季·定向越野活动在学校举行。

参加活动的校友们齐聚学校，做活动前的准备工作，校友们一共分成四组。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在比赛开始前，准备了一些热身小游戏，有你画我猜、夹珠子、撕纸过环等，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游戏。游戏环节之后，各组校友纷纷出发，游览了校园，感受母校近年来的变化，并在校园中寻找任务点。

校友们游览完校园并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后，陆续回到会议室，校友们进一步自我介绍，相互沟通 and 交流。校友定向越野活动圆满结束。



2018 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举行

2018 年 6 月 22 日，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校友事务理事聘任仪式暨第一次理事会在图书馆五层会议室举行。经过各院系、中心推荐，共有 83 位毕业生担任 2018 届校友事务理事。

校友办副主任蔡芝芳向各位校友事务理事介绍了我校校友会在国内外地方分会的建设情况和未来

规划，以及校友事务理事的主要职责，鼓励各位理事尽到联络校友的职责，做好母校与校友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各位校友事务理事分别做了自我介绍，就校友工作的一些问题提问，并面对面建立微信群，以便今后沟通与交流。

北外日本校友会举行夏季联谊活动

2018 年 8 月 7 日，北外日本校友会在东京举行夏季联谊活动，30 余位在日校友参加活动。活动中，校友们畅叙友情，交流职业经验与生活感悟。

之后，校友们意犹未尽，在微信群对北外日本校友会玉车连会长对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向虎秘书长对活动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并纷纷赋诗纪念此次活动。

1977 级日语系徐一平校友赋诗：

东瀛酷暑热浪翻，
校友纳凉把酒干。
师哥学妹同欢乐，
一曲高歌震九天。

1985 级日语系黄国庆校友赋诗：

沁园春·东京
酷暑犹存，秋蝉将鸣，原宿纳凉。
看窗映光辉，杯推喜悦；学长矍铄，后辈倜傥。
岁月蹉跎，芳华依旧，无论得失皆堂皇。
遐想处，望星空灿烂，世间繁忙。
追忆北外课堂，寒窗前求意气飞扬。
荟京城才俊，江南谢女；激扬文字，唯我轩昂。
西门立雪，东院夜雨，鹰击长空尽翱翔。

且梦醒，想风清云淡，闲步庭堂。

1988 级德语系吴志明校友赋诗：

纳凉

白鹭翩翩邀人赏，
荷香郁郁沁心房。
日暮西里走原宿，
凉宵北外聚一堂。

1993 级日语系范猛校友赋诗：

本来自九州，师门出同源。
今宵扶桑聚，心回青春年。



促管理学科大发展 纳四方英才来北外

——访国际商学院教授、人事处处长张继红



人物简介：

张继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曾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大学的访问学者、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人事处处长，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承担完成和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出版专著、编著、译著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重要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笔者有幸采访到了我校国际商学院教授、人事处处长张继红。短短的采访中，便可体会到他工作的繁忙程度与涉及工作之繁杂。

张继红有着丰富的教育经历与工作经验。1991年在云南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后，他曾任昆明理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在此期间被评为昆明理工大学十佳青年教师。后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学习并获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任教，随后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做博士后，学习了更多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数学专业的学习经历为管理学的学习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使他非常快地进入了学习状态，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导师的引领与教导，以及北京一流的学术氛围，也对张继红的钻研学术科研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相比在云南工作读书工作的几年，张继红坦言在清华大学与北外的这段时间是他学习和工作中进步最快的几年。在好的学术氛围下，使得张继红不断磨练自身，成长为更优秀的教师。

谈及出于何种考虑最后选择在北外工作，他回

忆起刚刚来到北外，国际商学院最初建立起时的情景。当时教师资源紧缺，张继红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北外这样一个有一定影响力和学术氛围的学校中实现自己“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愿望，便在2002年中科院博士毕业后选择了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当时他最大的目标是在北外这样一个以语言专业见长并作为立校之本的大学平台上，将管理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变优，使其成为北外新的招牌学科。根据学校部署，遵循北外办学理念，张继红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同开展起了如火如荼的学科建设工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于2001年成立，前身为英语学院的经贸学科，2004年分离后独立为国际商学院，细分为如今的工商管理、金融、国际贸易等专业。可以说在2004年至2018年的这14年间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优势，促成、见证了北外国际商学院的今天。2010年，张继红成功申请到了北外国际商学院管理学工程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今年之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所拥有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仅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北外优势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于去年开始申报，

今年年初被评为学校第二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际商学院管理学科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凝聚着张继红多年来艰辛工作与辛勤努力的汗水，也是所有商学院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北外任教多年，与北外风雨同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的成长，在张继红眼里，相较平均水平来说，北外学生整体素质高，求知欲强。除此之外，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外语学习能力也让他夸赞不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所有到北外的学生，不管是非语言的学生还是语言专业的学生，流利的英语都是他们求职场上的重要加分项，也是身为北外学子必备的素质。”而北外商学院的学生相较其他商学院，流利自如的英语不仅仅是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更是让求职单位信任其专业水平的前提。“身为北外毕业的学子，英语水平不过关，又怎么能让人信任你的专业水平呢？”张继红如是评价道。所以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张继红都要求学生保持较高的英语水平，在北外学习期间务必做到持续提高。

在国际商学院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丰富的教师群体自然起到了主要作用。从英语学院分离而来的国际商学院，拥有着同时取得英语文学学位与经济管理学位的教师人才。虽然专用英语学院的建立分离了一部分英语教师，但兼备跨文化交流能力与管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都留了下来。他们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还在发挥着外语教学的作用，毫无疑问成为了国际商学院教师的中流砥柱。

谈到北外如今面临的教学改革方向，张继红提到了最近召开的本科生教学工作会。“本科生最为重视的自然是基础教育，你的基础有多厚，你的未来发展就有多高。”张继红认为在北外，首先学生们的语言优势要保持。如今外语教育成为流行，社会上由于家长重视孩子们外语水平的提高，接受外语教育的方式日趋成熟，途径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仅仅掌握外语专业知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和当今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发展要求。除语言过关之外，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才是我们当今所培养的目标。

在本科生工作中张继红提及的另一个重点便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通识教育是我们打好基础的方式和途径。提高通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是学校教育水平进步的重要

方向，也是竞争双一流高校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识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思考能力、学习能力，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不单单是知识量的增加，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才是有助于学生们拓展视野，深入思考的前提。张继红强调，学习知识要深，基础要扎实，知识面要广，这样学生今后才能更有发展前途，人生道路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张继红不仅在国际商学院教授管理学课程，担任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还任学校人事处处长，他统领和管理全校的人事工作。针对学校人才培养方向，在人才引进方面，学校目前着重引进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管理学与经济学领域、中国语言文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教育学领域，以及新闻学、世界史、艺术学等领域的拔尖人才。对于引进人才的要求主要是：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熟悉高等教育规律、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情况，具有深厚的学科建设经验、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视野开阔、创新能力强，把握本学科学术发展规律和学术前沿，具备国际化办学理念和引领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思路；政治素质过硬、政治立场坚定、富有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师德修养、职业精神、团队意识和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思想境界。通过引进优秀人才，提高学校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

针对北外今后的人才培养目标，张继红对本科生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第一是要把基础课学好，学习的本分要做好；二是外语水平要持续提高；三则是要全面发展，提高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多多参加社会实践与社会活动。北外要培养的是外向型人才，这便要求学生拥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较高的领导力。多多参与社会实践与社会活动有利于学生们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方向不断进步，逐渐掌握其所应具备的能力。最后则是强调学生们要培养爱国情怀，基本的政治素养与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些都是北外当下所培养的国际化人才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张继红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成为合格优秀的北外人。

(文 / 李念)



育人，育己

——访体育教研部南征教授

人物简介：

南征，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曾在北京科技大学任教。1990年调至北外体育教研部任教至今，我校体育教研部副教授，担任游泳、排球及羽毛球专项课的教学工作。创建北外男排，带领学生1996年、1998年在高校排球比赛中两度获得冠军，2006年获沙滩排球冠军，2018年在“首都高校阳光体育排球联赛”中获得气排球亚军、六人排球季军，第一届中国气排球公开赛大学生男子组第六名。2014年作为带队教师参加学校“歆语工程”，先后完成鹤庆、晋江、淮安、陇县的支教工作。曾荣获“路桥园丁奖教金”。

一个工作日的清晨，笔者在体育馆二楼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北外体育授课类型最多的南征老师。除开鬓角掺杂着的几根白发明证了岁月的流逝，身着短袖加运动长裤，步伐矫健的南征老师看上去年轻而精神焕发。他语速平缓，思路清晰，娓娓道起了他与体育教学的点点滴滴，谈吐间透露着不俗的个人素养。

机缘巧合，步入体育事业

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体育教育行业的，南征回忆起了大学时代。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的南征在大学期间接受了四年体育教育专业的训练与学习。而事实上，步入体育专业并非他的初衷。

南征的父母均为中学老师，他的姐姐于1977年考入大学，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在这样的氛围下，南征一开始便认定了高考这条道路，选择像普通考生一样，考取普通大学。在当时的1979年，入学率仅仅是千分之一，大学生极为稀少，加之他的故乡河南省人口众多，考取大学的难度可想而知——两次备战高考，均未取得理想的结果。对此，南征在体委工作的邻居建议他尝试走体育这

条道路。实际上，他在1979年之前一直有练习体育项目，尤其是排球，还曾进入过少年体校锻炼学习。有这样的基础，他想，不如就试一试走体育这条路。结果这一试，正好赶上上海体院第一次在河南招生。他的体育加试分非常高，文化分也远超过要求，就这样理所当然地被上海体院录取了。

那个年代，体育教育专业对每个项目要求都比较高，范围也广，强调的口号是“一专多能”，毕业拿到是教育学证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征进一步奠定了自己体育能力的基础，接受了多种项目的系统学习，比如田径、游泳、足篮排三项等。

“一方面是建立了体育教育的一套理论体系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去教学，比如说教足球、排球、篮球等等从哪开始入手；第二个就是自己通过这四年在各个专项上也有一些提高。比如说排球，以前在体校的时候也没有学得太好，但是通过大学教练的一些点拨，自己的一些训练，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南征认为，大学本科教育首先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话，很可能现在我也就是个待业青年。具体干什么工作，现在都很难讲。”他感悟到，大学这个平台，对于人生

来讲非常重要，尽管体育不是自己的初衷，但它在人生中确实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初入工作

毕业后，南征被分配至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执教。该校特别注重体育教学和体育运动队。南征的教学指导陈德庠先生，“他不能叫老师，应该叫陈先生”，对于南征的教案书写、上课时间的控制、示范能力等要求非常严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现在很多老师也不在意这个，比如说在跑道上跑步，如果大家就是短距离测的话，测50米100米的话，对于这个方向问题，陈先生就会很严格，他是绝对不允许逆向跑，应该按照跑道顺时针跑。所以其实我工作一直到现在，还是会坚持这样的做法。”

“其实不单是教学，体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学校里受到的锻炼还是挺多的，包括后来一个教排球的老师生病了，我甚至特别仓促地接管了学校的排球队。”经历了适应期，南征迅速地累积起了经验，加之教专业课期间积累的知识，很快地成长了起来。

虽然工作一点点步入正轨，但他并未感到十分安逸。“这一段要说遇到什么困惑，就是对于体育课的教学意义，好像不大明白……没有感受到特别明显的成就感。”体育老师这样一个职业尽管在大学里也很重要，但毕竟还是一个不能引起学生足够重视的专业。到底体育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进行培养？南征并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有想过从事其他行当。不过，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阅历随年龄增长，心境也有了变化，这些曾经的疑惑也渐渐消解。“就是一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大家在做不同的事情，这份工作也有它的优点。天天都能面对着年轻学生，心态放松，还有一个有非常长的寒暑假可以休息。”体育课原本就无需过多备课，在学校检查机制取消后，也不必在形式上多花精力，此时的他已经对于体育教学十分得心应手，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格和理念。

执教北外，接手男排

1990年，南征被调任至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工作。“北外体育部的负责人对我说，把我调来这里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要把男排这项工作做起来。”此前北外曾有男排校队，但未能成一番气候。

刚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他即着手开始组建北外男子排球队。

几乎从零开始的筹备工作遇到了不少阻碍。当时的北外，体育后勤保障较为缺失，也没有专门的排球场地，连水泥地都没有，就是几块土地。土地场地是要洒水、划线的，这些工作都没有后勤工人去做，南征不得不自己动手画。

除了工作方面的要求，驱使南征致力于创建北外男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于运动训练与运动教学两者区分的思考。“体育教学它就不强调量化，追求的更多的是体育项目的普及，而且对于个人奋斗方面就比较弱化。比如同样一节体育课，哪位体育任课老师都会觉得自己教的最好。而体育训练就大不相同了，作为教练的身份，个人水平和所付出的努力终会通过运动比赛的成绩显现出来，而这也是差距所在。作为体育教练，后者更能让人体会到成就感与获得感。”

在南征的带领下，北外男排逐渐成规模并多次参加比赛，均取得了骄人成绩，于1996年、1998年两度在高校排球比赛中获得冠军，2006年获沙滩排球冠军；在“首都高校阳光体育排球联赛”中又获得了气排球亚军、六人排球季军的佳绩。2018年5月，北外男排在第一届中国气排球公开赛中又获得了大学生男子组第六名，这也是一个空前的成就。首先北外男排并非是一支高水平运动队，成员都是普通学生，此外，这是北外排球队第一次参与全国比赛，在此之前学校规定只能参加北京市高校比赛。“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自己筹措经费，就为了参加这次比赛，竟然就获得了一个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我觉得这也应该说是对我自身工作的一个褒奖。毕竟这么多年，还能坚持在一线带队，而且带领的是非高水平运动队，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成绩，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告慰。”

南征作为教练的带队能力得到了体现，并被进一步认可。在执教校队期间，南征还被中国人民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聘请执教。这支队伍在他的带领下，获得了两届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亚军，后参加德国青年五项比赛，甚至夺得了世界冠军。“其实只要坚持不懈，做好自己的本分，很多美好的事情它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南征很认真地说，自己其实并非是一个优秀的人，只是认真而踏实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等来量变到质变，一步步累积经验，

吾爱吾师 TEACHER STORIES

取得成就。

慈不带兵，亲身示范

南征将自己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思路，总结为他所崇尚的“慈不带兵”，同时，他十分强调作为一位体育老师，拥有示范能力的重要性。

南征是北外目前开授课程类型最多的体育老师。当被问到是如何掌握这么多门体育项目时，他开心地笑了起来，“我觉得首先确实要具备一定的体育天赋，到体育大学学习以后，我发现自己在体育教学示范这些方面确实具备一定的天赋，言外之意就是学什么像什么吧。到现在，我们体操老师对我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他对我说，那么大的个子，体操动作做得那叫一个漂亮。”

之后到了工作岗位，就慢慢依靠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好了，“我的兴趣爱好点比较广，比如说网球实际上是在我调到北外之后才开始接触的。我去看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那些老师打网球，发觉这网球竟然这么有意思，这才开始学习打网球，进步得还挺快。”南征说，自己一旦觉得感兴趣的话，就会在上面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不止在技术上，还包括各种裁判理论、教学理论上。当时他还没有车，于是自己骑自行车全北京市到处跑，只要有网球的培训讲座他都去听。恰逢当时网球也处于一个普及阶段，网协开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只要有办班我都会去参加，所以也就提高得很快。”“我觉得除了排球以外，我打网球真的是到了一个自认为还不错的水平。”在北京市“健康杯”业余网球比赛中，他曾经得过两次双打第四名。此外，同李娜老师合作，他们还获得过全国的外语院校协作组网球比赛的冠军等等。

“我抱有的是这么一种理论：我觉得体育教育，它无论是一个表象教育也好，感性教育也好，首先作为一位体育老师，你必须会正确示范，而且必须会非常标准地示范，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来教学生。”南征说，他教游泳时，“如果有学生质疑老师，你整天不下水，你真的会吗？那么，回答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衣服一脱，用一个非常漂亮的入水扎下去，就这么简单，什么多余的话都不用讲。这跟学历跟你理论程度没有丝毫相关，体育教学就是这样”。

也正是为了能够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标准而漂亮的示范，南征曾“恶补”自己的羽毛球技术。“如



果说打到现在的话，我也不敢说我这羽毛球有多顶级，但是我应付体育教学绰绰有余。至少是在我们体育部这些老师的范围内，除了专业学习羽毛球的迟老师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说 he 比我打得好。”其实，南征教授的所有项目都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只要是他要教这个课，就必能做到让别人信服。“这不是说一般的信服。原来一个毕业的游泳课学生，他在作业里说，我把上衣一脱展示入水的时候，马上引来一片惊呼。不管我年纪多大，只要我上课，就要这种效果，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南征严厉的教学风格，得益于他崇尚的“慈不带兵”的理念。“我就是会很严厉，不过这种严厉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表面上的严厉。也就是说，私下里还会尽我的耐心，尽我的能力去辅导和帮助学生。”南征表示，对于学生的一些专业的动作和水平，是不能有松懈的，但是在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更愿意成为一个慈爱的朋友。“用一句非常现实的话说，就是我在教学时的确非常严厉，但是我在最后给学生打分，真正给学生成绩的时候，其实非常宽松。我基本就是这样，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风格。”

在教学生涯中，南征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十年前，他给学生上理论课时曾讲到制定训练计划，课下竟然有同学按他教授的方法去制定自己的计划，并且及时地进行反馈。这样简单的事情，却是南征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其实我觉得这就回到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终极任务是什么？”之前提到了南征在刚入职时的困惑，他表示，当时其实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到了现在，在这任教多年且快要退休的时刻，他会时不时地思考其意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教会他们的，其实是一种终身锻炼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过的这些所有专业里面，我独爱教游泳专业。你把一个不

会游泳的人教会了游泳，教会他一项真真正正的体育锻炼的技能，让一个连漂都不会的人，最后学会了游 200 米，而且他觉得这个项目他可以去爱，将来也一定会去游泳。这就是锻炼身体的理念与方法，如果这些东西能传授给学生的话，我觉得比教会某一项技能要好得多。”

体育应该是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南征自身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与体育和教育紧密相连。“体育运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首先是我生存资本，此外，也是我将终身保持的习惯。”南征说，如果有一两个月不去健身房或者不打球的话，他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我现在是一个礼拜至少去一次健身房，打三次以上的网球或者羽毛球，这对我来说是必须的。体育不单是我的职业，它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年轻态的体魄外形。”

然而，对于北外学子参与体育教学与进行体育锻炼的现状，南征还是有许多忧虑，他指出，目前就北外学子整体而言，参与体育课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还是较弱。常年参与招生工作，他表示，目前社会，尤其在高中这个阶段，都会减化体育锻炼的时间，大家都形成了一种“好静不好动”的习惯。为了争取高分，的确没有过多运动的时间，而这逐渐成为了一种惰性，也可以说是惯性。

他回忆到，有一节游泳课是在学期末进行考试，他宣布了不考试的同学可以提前走之后，有一位已经换了泳装的同学，竟觉得自己好似吃了很大的亏。南征说，他看到以后，在那一刻突然觉得非常的失败，非常的悲哀。“我们学校选上游泳课的学生，那真是太有福气了。我跟他们举例，那么好的游泳场馆，所有的灯全都打开，那一个灯一个小时就一度电啊，你可以数数多少个灯，这样的成本，再加上这些水等等……所有这些设施免费给大家用，还有老师教。但是，大家回馈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南征说，他自己若是拥有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游泳，因为每一次其实都算是一种莫大的福祉，这样的机会，在以后是不会再拥有的。“所以就通过这一点就说明，咱们有的同学缺乏发自内心的对体育的一种热爱。”

面对这种现状，南征首先想到的，还是努力通过老师自身的带头示范，让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喜

欢上体育项目。他说，其实头几年自己还会将头发染黑，目的就是让自己有更加年轻的形象，让学生乐于看他示范，愿意学习。“我刚才也讲过了，教授游泳，我当然会下水，我要做亲身示范；上羽毛球、网球课的时候，我都可以跟单人挑，你不服的话我们俩可以打。我就做到这种地步，通过这些东西来影响大家，让他知道体育锻炼是有它一定的收获，比如至少比起同龄人，我的机能退化得少得多。”

体育之外

2014 年起，南征开始作为“歆语工程”的带队老师与学生们一起远赴外地支教，先后完成鹤庆、晋江、淮安、陇县的支教带队工作。生于教师家庭，南征始终秉承着要把教育推广到最需要教育的人身上的一种理念。“歆语工程就是要把语言教学推广到这种语言教育的落后地区。对于我而言，我就觉得只要能参与支教，只要能参与对教育弱化地区的帮扶，就是一项造福于社会的工作。这种工作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这是我作为教师的操守和职责。”从去云南开始，南征的“歆语之旅”一发不可收，“只要没有什么天大的意外，譬如得病，我每年都会参与，一直到我退休”。

回顾往年的历程，歆语工程留给南征的深刻印象实在太多。他认为，首先歆语工程对我们学生本身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锻炼过程，它的价值是其他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不可替代的，它是学生直面社会、直接同社会接触、完全独立的实践过程。此外，他认为，北外学子在歆语工程中，充分地展示出了北外学生的能力。他举了代表团在晋江的那次经历作例子：“晋江的那次实践实际上是完全由我们学生自己承办的，前前后后将近 20 天的时间，所有的学生设计了每天八节课的课程，所有授课都是由我们学生来完成。最让人觉得称奇的是其中有一对搭档，这两个学生居然能坚持把一个初二的英语课从头教到尾。”南征说，其实这就是对“高分低能”最有力的反驳之一，通过高考筛选来到北外的学生们，毕竟都是精英，但平日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机会展示，而歆语工程，通过给予学生极大的自主性与发挥空间，激发了他们的潜能，同时又带来新的提升与感悟。

南征说，其实歆语工程还有一个重大意义，是对于接受教育的孩子们而言的。他回忆到，当时在



淮安教学，一个孩子的家长留下了老师的微信，于是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就会询问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一定让孩子继续跟着你们上课。这位妈妈说，孩子通过歆语工程的教学，喜欢上了英文，喜欢唱英语歌，每次英语都在年级排第一。“这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这才是歆语工程最大的意义所在。”

响应北外“全员招生”的口号，南征在体育教学之外，还积极地参与到了招生工作中，并成为北外面向河南省的招生工作主要负责人。为了做好招生工作，平日里，南征要做的工作就是从方方面面的了解北外，研究北外的招生政策和学校特点。“其实做招生这块也是实现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职责和本分，在北外执教，就要为这个学校来代言。”

作为一位体育老师，南征表示，这也是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在招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非常仰慕你这个学校，再加上通过你的一些招生宣讲，他会仰慕你这个人。他们会很奇怪，老师您是体育的，意思就是，您怎么懂得这么多？”仿佛是又看到了人们询问时惊讶的神情，南征老师笑得十分自豪。“其实这样我是需要做功课的，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多少语言，还有语种语系，这些东西我要懂，否则我怎么去跟别人讲，怎么把学校的一些特点展示出来。说到这些，别人就会觉得，北外的老师知识真渊博，连体育老师都这样。”

发挥优势，开拓自我

对于广大北外学子，南征寄语道：发挥优势，开拓自我。他谈到，北外的学生都是经历了层层筛选而来的，都是精英人才，至少在某一方面有非常过人的本领，所以首先要保持并且发挥自身的优势，树立更高远的目标，站上更大的舞台，实现更大的

人生成就。

此外，便是学会利用好学校提供的教育环境，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把自己打造得更完美，走上社会后能够成为栋梁之材。“就这么简单，所有的家长、老师都是这么希冀自己的孩子和学生的。学校有这么好的条件，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国际班、国际交流等，都是提升自己和拓展、实践的机会。”

作为北外“最全能”的体育老师，南征不仅做好了体育教学工作，还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招生育人工作中，同时又以自律自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停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他又何尝不是在发挥优势，不断开拓自我呢？

(文 / 杨宇凡)



墨过痕留却无声

——访马振岗校友

人物简介：

马振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1965 届校友，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回国后，就职于外交部。曾在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驻加拿大大使馆、驻美国大使馆工作。曾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每当想到自己虽是个平凡的人，从事的却是为祖国、为十三亿同胞争光谋益的伟大事业，而不是碌碌虚度一生，就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马振岗

闲暇时，马振岗喜爱挥墨写诗。他的书法沉稳不失大气，诗句质朴中带着豪情。他如一幅没有过多笔墨的山水画，简单的线条、单一的颜色中却蕴含了无穷的能量、深刻的哲理。他是从山东走出来的外交官，身上透着山东人与生俱来的稳重和豪爽，谈到激动处，免不了几声哈哈大笑。

北外求学时的青涩懵懂，而立之年在南斯拉夫的成长历练，成为驻英大使后的踌躇满志……点点墨迹，绘成一幅起伏跌宕的人生画卷，顺着时间的足迹，层层铺展开来。

废寝忘食山水间

马振岗生长于山东青岛。青岛位于黄海之滨，

胶州湾入口处，依山傍海，是众多文人墨客眼中的天堂。老舍笔下，五月的青岛“到处花香”，“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梁实秋也曾在《忆青岛》中大赞青岛“称得上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

“背依崂山，南临黄海”描写的是青岛二中的地理位置，马振岗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代。学校离家很远，大约有十几里路。马振岗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跑一个多钟头才能到学校。除了高三住校外，他步行了五年，基本上没有坐公交车，也没有骑自行车。“我五年没请过假，没迟到过。”马振岗说。虽然有艰辛，但是正因为这段时间的磨炼，造就了他良好的身体素质。中学期间，他多次参加学校的长跑比赛，还跑过一次马拉松。他诙谐地说：“我跑的这五年，可把身体给锻炼好了。”

高中是孕育梦想的殿堂，马振岗原想考清华大

学自动化控制系，这在当时属于工科里前沿学科的专业。那时候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大都想学习工科，毕业后到工厂里先干技术员，将来再努力当上工程师，就是理想的前途。“当时我觉得挺有把握考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马振岗对自己的学习很自信。正当他全心全意为奔赴清华而战时，命运之神却给他送上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但是由于国内培养能力不足，从1951年开始，新中国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开启了建国以后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序幕。从1951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为止，我国先后派遣大量青年学生、干部赴苏联留学。

当时到苏联留学是青年人最热切的希望。马振岗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被学校推荐报考留苏预备生。如能考上留苏预备生，对自己对学校都是很荣耀的一件事，马振岗自然全力以赴。但在高考前一个月，他被告知大部分留苏预备生要改学文科。马振岗对弃工就文毫无思想准备，心里虽觉别扭，但想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也就欣然接受了。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时间十分紧迫。马振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最终顺利通过了高考，收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

赤子勤学北外缘

一纸通知书在手，马振岗激动的心情下隐藏着一丝忧虑：去北京的路费以及出门携带的被褥行囊等费用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马振岗利用假期打工，赚足了赴京的路费。带着母亲费心准备的被褥和几件衣物，他告别亲人和学友，第一次离开青岛，满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只身坐火车前往北京。经过15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他来到憧憬已久却又十分陌生的首都。此时，北外的学长们早已等候在车站外，他们的热情让马振岗顿时感受到了“新家”的温暖。

开学第一个月，马振岗和各地汇聚而来的留苏预备生参加了学习培训，正当期待着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情况出现逆转。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所有文科学生一律不再派出，全都留在北外学习。就这样，留学苏联的梦想顷刻间化为泡影。

按照新的安排，这批不再派出的留苏预备生将

先从英语、法语、西语、俄语当中选择一种语言学习两年，然后再到国外学习斯瓦西里语等小语种。留学不成了，有些同学要求转到其他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各大学招生已满，而且已经开学一个多月，难以重新安排这么多学生。就这样，马振岗被分到了英语系。学校招收的本科生编为英甲级，他们这批学生单独编班称作英乙级。

马振岗在中学一直学俄语，除了数学课上知道的几个英文字母外，对英语是一窍不通。年已19岁的他，只能从ABC抓起。每天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苦练发音，每人拿着个小镜子，对着镜子一遍遍“A, A, A”的叫着，纠正口型。很艰难，也很枯燥。甲级的同学英语基础好，又早上课一个多月，乙级还要赶他们的进程，困难可想而知。乙级的同学中学时都是班上学习的尖子，此时落到这种境地，心里难免有些落差。

有的同学开始悄悄温习数理化，准备第二年重新考大学。马振岗也受到影响，寒假回家时把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带回了学校。就在这时，陈毅元帅到外院做报告，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发展讲到国家对外语人员的需求。没想到国家如此急需外语人才，马振岗一颗赤子之心受到了触动，便逐步坚定了学好英语的决心。

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马振岗十分感激北外老师的激励和指引。由于初期心思不定，精力没有完全用在英语上，而且受俄语的影响，脱口而出的都是俄式英语。但他们大都带着不辜负祖国期望的决心，努力克服初学英语的困难，一步一步往上赶。由于底子太薄弱，道路自然艰难曲折。一年下来，马振岗所在的班里，竟有五人不及格，这个班也被拆散了。

马振岗成绩还算不错的，但一般也就是4分，属于中等水平。大学二年级时，班主任林乐杨老师为了激励他努力学习，一次期中考试，有意给了他两个3分。林老师问他：“马振岗，你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感觉不怎么好受。”老师说：“我故意给你3分，就是为了刺激刺激你，让你再努力些。你总是4分4分，这怎么能行！”马振岗虽觉得有些委屈，但想到老师实在是用心良苦，刻苦学习的自觉性更强了。

到了三年级，乙级部分同学转到新设立的亚非语系，其余的继续学习英语，并和甲级混合编了班。和甲级同学相比，马振岗感到压力更大，差距也促

使他产生更大的动力，经过刻苦努力，他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大学毕业时，原来乙级同学的英语水平普遍明显提高，大多数赶上甚至超过了甲级同学，马振岗也拿到了满分5分。

马振岗一直爱好文学。他中学时就读过不少古典文学如《水浒传》和《西游记》，还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苏联、美国等外国文学作品。大学期间，他开始重点阅读英国文学书籍，特别喜欢查尔斯·狄更斯写的小说。他说自己读书有个癖好，凡是喜欢哪个作家，就会把他（她）的书都找来看，如巴金、赵树理、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等。他自嘲说，有时有些不自量力，大学二年级硬要啃简·奥斯丁的《爱玛》的英文原著，读一页经常要查二十来个英文生词，竟然咬着牙看完了。

他看外国小说还曾闹过笑话。中学时读外国小说，看到外国人吃完饭后要吃“布丁”，他和同学们都很纳闷，“布丁”怎么能吃呢？有位同学说可能吃“布”能够帮助消化。他们以为布丁是碎布头，后来才知道布丁原来是饭后一种甜点。广泛的阅读使他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语言水平，也拓宽了视野，对他后来的工作帮助甚大。

马振岗读书期间也面临一些心理压力。记得一次假期回家，院里大娘看见他说：“小岗啊，你别学了。你看我们院里和你一般大的都工作了，一个月挣50多块。还有的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能伸手向父母要钱呢。”马振岗听后觉得特别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劳动人家的孩子上大学特别不容易，这却也激励他更加发奋努力。

“知识累不死人！”马振岗语重心长地说。他希望在校的学友在平时要多积累知识，多锻炼独立

生活能力，不要怕将来用不着。现在大学生活条件比那时好出许多，但不能贪图安逸，应该多找机会炼“身”和炼“心”，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困难自怨自艾不行，要学会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马振岗读二年级那个班出了七个大使，有孙必干、刘宝莱、梁栋、姜恩柱、朱曼黎、邹明榕。他强调说，不是说这个“摇篮”的孩子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优秀的外交官，而需要抓紧在校时间打好基础。北外有良好的历史传统，希望能够把这种传统好好地保持下去，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出更多的人才。

初到英伦炼就胆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中法建交，当时估计我国外交局面可能出现历史性的突破，将会需要一大批翻译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国家领导未雨绸缪，决定增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语言。马振岗毕业后也被选派到英国进修。他幽默地说：“我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没去成，反倒去了资本主义的英国。”

1965年秋，马振岗第一次西装革履地到了伦敦。在英国，他先在伦敦伊林科技学院学习一年，后考进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留学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培养“高级翻译”。他原以为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国家进修，条件一定很好，但入学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英国大学并没有专门培养翻译的学科和课程。在伊林时，老师又是从ABC教起，讲一些英语基础知识和语法。北外毕业的几位同学都感到受益不大，只好“另辟幽径”。一是认真听课，把老师讲课中使用的一些地道英语表达方式和语句记下来。二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对话，例如主动同房东家里人交谈。三是坚持听广播，提高听力。四是阅读英国的报刊书籍，他坚持研读《卫报》和《泰晤士报》，不仅能够了解时事政治，还能够学习语言，凡是有意思的句子，他就拿小本记下来。

马振岗认为，在英国学习这段时间，对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一是练大了胆，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都不心怯。二是顺了耳朵，各种各样的英文大体上都能听得懂。”去英国前，他说英文时总是顾虑语音、语法，不敢开口。到英国后，他发现南亚、非洲和英国本国人不怎么讲究语法，但是完全不影响沟通。他很奇怪，就请教房



图1 北外毕业合影。照片中第二排中为外教伊莎白，后排右起第二位是马振岗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东老太太。她说：“你们中国学生发音很好，语调也不错，但你们每个字都说得太重，太慢，听起来特别吃力。”他一想也对，就是说中文，如果每个字都说得一样重，一个字一个字向外蹦，听起来也很困难。“思想解放了，胆子也大了，讲起英文反而顺畅多了。”他感慨地说。他记得出国前，在北外校门口遇到外教柯鲁克夫妇，其实伊莎白教过他两年，可他还是紧张得不得了，几句日常话也结结巴巴半天说不顺畅。这件事像压在马振岗心里的一块石头，驱使着他一直注重口语练习。一年后，柯鲁克夫妇到伦敦，马振岗在驻英代办处又见到伊莎白老师，他讲起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应询头头是道地讲述了《等待戈多》这个剧本的概要，一口气说了十多分钟，伊莎白老师惊讶地夸奖说：“马，你现在说得好流利呀！”

那时留学生都是公派的，费用全由国家承担。食宿交通都能保证，但零用钱很少。起初是每月四英镑，后来减少为两英镑，最后是一英镑，那时一英镑大约是七块九毛人民币。这点钱要用来支付笔记本、纸张、参考书等学习用品和日常生活花销，当时一本牛津字典就要花一两磅多。但马振岗他们知道国家的钱来之不易，每分钱都来自国内人民的辛勤劳动，所以都非常节省，平日连水果都基本不买，更不用说其他消费物件，也从不到英国各地游玩。尽管生活很艰苦，但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

“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马振岗他们中断了学习，全都奉召回到国内。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



图2 1965年10月马振岗在英国留学期间初次拜谒马克思墓

一个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马振岗和外交部留学回来的那批人一道，被送到广东汕头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明确说定，“再教育”时间无限定，将来无定向。简单讲，劳动艰苦不说，前途很迷茫，思想很郁闷。在农场，种水稻、拉犁耙成为了日常的工作。因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拖拉机也不用，而是几个人拉一张犁。那里冬天气温只有几度，他们浸在冰冷的稀泥中整修田地，上面穿件破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苦归苦，大家都干得十分卖力。艰难困苦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增进了相互的友谊。在牛田洋经历过“再教育”锻炼的，至今仍互相称为“牛友”，外交部的“牛友”们，许多后来都成为杰出外交人才，包括李肇星和陈健这些“牛友”。

他们还经受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巨大台风暴雨袭击，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1969年7月28日上午10时半，第三号强台风在汕头沿海登陆，平均风力在12级以上。汕头市区海潮急剧上涨，市区被淹，水深2.3米，郊区及各县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深4米左右。为保护牛田洋这片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在牛田洋的官兵和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参加了抗灾救国的战斗，同强风暴雨和汹涌波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保卫大堤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场斗争中，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牺牲了。马振岗的一位好朋友，同是北外和留英的同学肖华山，在即将结婚的时候，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马振岗忆及此事，语气变得很沉重。28日那天，他们学生一连奉命前去抢救大堤，风狂水险，但在



图3 1970-2-24牛田洋学生二连九班战友合影，后排左起第二是马振岗

危难面前，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堤被冲垮后，海水滚滚涌进堤内，他们依然坚守着，直到接到撤退命令后，才相互搀扶着离开。

马振岗在那里干了两年，农活学会了不少，英语却忘得差不多了。回忆在牛田洋劳动的那段时间，他感慨地说，那确实是种刻骨铭心的身心痛苦，但回过头来看，这段艰难经历，对人生来说也是一笔财富。人生总会经历很多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波折却也锻炼了人的性格。经历过艰险，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面对任何困难都更加坚定自信，对生活也更加务实和从容。他感到这对此后的人生道路还是很有意义的。

南斯拉夫历成长

1970年2月，马振岗等四十多名“牛田洋战友”第一批调回外交部。5月，他被派往中国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中国和南斯拉夫于1955年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70年，中南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近年来中南两国关系得到好转，扩大了贸易，增加了人员来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马振岗到南斯拉夫之际，正好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的时期。十多年前，马振岗曾踏上北上的火车，告别家乡青岛。他当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北京的许多夜晚，他时常思念家乡和亲人。十多年后，马振岗被派到异国他乡。都是告别，只是第二次更加难舍。但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在而立之年学有所用，一展抱负，报答国家这么多年的培养，所有的眷恋都化为一股动力。

那时候外交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当时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五十来个。在南斯拉夫，只有三十几个使馆和我国保持外交关系。马振岗幽默地说，向各使馆发照会，也就是三十来份，很快就能干完。

马振岗在南斯拉夫那几年恰好也是国内“文革”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大使馆也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周还要组织一次劳动。1970年8月，曾涛大使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地抓外交、发展中南两国的友好关系。谈起曾涛，马振岗说：“我从曾涛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一直把曾涛视为我在外交部的第一位恩师。”马振岗一生都十分敬重



图4 马振岗在南斯拉夫为曾涛大使与巴基斯坦大使谈话做翻译

外交官曾涛，一直把他当做自己工作的楷模。

曾涛大使强调，外交官应该走出去做工作，不要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东西。他说，外交官在国外花很多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不用出来了，在国内学不是更好吗？所以外交官应该走出去。这点让马振岗受益匪浅。

马振岗在北外学习的是英语，如今却要派往南斯拉夫，他觉得很纳闷：自己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啊！但是国家的安排千斤重，再难也要一肩挑。当时南斯拉夫还未解体，通用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隶属于印欧语系，是高度屈折语，有着非常丰富的词形变化，九曲回环，十分拗口，学起来十分困难。刚到使馆时，马振岗学习的第一句是十分简单的日常用语，就这样他也足足练习了一个下午。幸好他中学时俄语不错，俄语和当地语言有些共通之处，这帮了他不少忙。再加上马振岗在北外练就了一身学习语言的硬功夫，慢慢也就融会贯通了。

“吃饱睡好”也是马振岗需要练习的功课。“吃饭，睡觉”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习以为常的事，不值一提，但是对于外交官却不都那么轻松。餐桌经常不是享用美食的地方，而是开展外交的场所。吃不惯，吃不饱、吃不好，那是经常的事。有时一次宴会下来，连吃的什么都没有印象。此外，外交工作很繁忙，特别是碰上紧急事件，熬夜是家常便饭。若出国，还有个倒时差问题。若是睡眠质量因此受到影响，精神不振，在外交场合，这是大忌。

马振岗自称有着“国际肠胃”，什么饭都能吃，什么都能够凑合吃下去。马振岗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时给大使当翻译，练了一套吃饭的“秘诀”，比如尽量不吃难嚼的东西，吃肉时先切成小粒，趁领导吃东西时赶紧吃，来不及嚼烂吞下去也不成问题。至于“睡好觉”，马振岗说多出几次差，慢慢就习惯了。

那时没有电脑等新兴通讯工具，再加上国际长途十分昂贵，马振岗和家人一直以书信保持联系，每个月信使到使馆时，马振岗总是特别开心。“家书抵万金”，一纸书信寄来，若一切安好，悬着的心也就安安稳稳落了地。一次，信使到了，马振岗兴冲冲地去翻看信件，结果却没有家人的来信。心里一紧，他在焦急中又等了一个月。终于收到哥哥的信了，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母亲走了却未能见到最后一面，他痛苦极了，大哭了一场。当晚有外事活动，他硬撑着把悲痛咽下去，不露声色地给大使当翻译。“这类经历，我们许多外交官都有切身体会，”马大使说：“但一想到我们从事的是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的事业，肩负的是重要而神圣的使命，个人和家庭的事也就只能放在次要位置了。”

1974年，从南斯拉夫调回国内后，马振岗相继在外交部美大司、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等处工作，从随员、到秘书、再到参赞，不同的职位带给他的是不同的历练。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马振岗说外交部里的新人都是老同志手把手带出来的。老同志修改文章时，甚至是指点如何在外交场合安排菜谱时，自己都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1997年，马振岗成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他驻英期间，香港顺利回归。他说：“这是国家的荣耀，也是自己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

香港回归齐欢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

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此时，无数中华儿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期待已久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东方明珠”历经150多年的沧桑后，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香港回归，我们永不能忘记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他的“一国两制”英明决策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开辟了道路。我们也不能忘记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孜孜操劳的每一个人。马振岗作为当时的驻英大使，也尽了自己的职责。

马振岗出任驻英大使面临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香港问题。1997年3月16日，他抵达伦敦履任，此时距香港回归不到5个月。他出发前得到的指示是：配合国内外外交部等部门，做好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这项任务十分光荣，也非常艰巨。马振岗过去从未直接接触有关香港的工作，熟悉政策，了解情况，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香港回归前，马振岗要到各地演讲，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目的很明确：让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立场，做英国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那段时间，他真可谓是“食不知味，寝不安席”。

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本已达成协议，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也妄图变卦。彭定康担任末代港督之后，公然推出一个违反中英三个协议的所谓政改方案，为香港回归添置了障碍。中英双方围绕一些核心问题斗争激烈，形势严峻而复杂。

到任的第二天，英国开始大选，政府政要忙于竞选，找人做工作都困难，他挺着急。大选中英国工党赢得胜利，5月1日，工党领袖布莱尔出任首相。在对华政策上，布莱尔提出两条，一是“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是“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使马振岗看到契机。马振岗拜会新任外交大臣库克时，库克表示在临立会问题上，新政府不准备挑战中国的立场。关于驻军安排问题上，他也表示将对中方要求予以“积极考虑”。但很快，英方就否认，并称中国大使“误解”了库克的话。马振岗几次找英国外交部官员做工作，英方虽承认是他们“搞错了”，却坚持不肯让步。在英国外交部一次招待会上，马振岗抓紧机会做库克的工作，他听后急忙说：“今天不谈此事！”握了下手就匆匆离去。

1997年6月10日，马振岗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

他应媒体大亨默多克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酒会。一进客厅，女主人热情地把他带到里间，原来是几名英国内阁大臣在那里。马振岗正和财政大臣布朗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他突然对马振岗说：“托尼来了，你要不要见见他？”马振岗一回头，看见布莱尔朝他微笑，就赶紧走了过去。

马振岗对他说：“我已经注意到你关于中英关系的讲话，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相信会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他正要谈香港问题，布莱尔就接过话来，表示：“欢迎你到英国当大使，我的政府将同你合作，推动我们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并紧接着说：“我相信，香港问题应该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我们将努力使香港问题顺利解决，我已经决定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

马振岗立即想到，本来双方商定由外长做政府代表，现在首相要出席，显然是提高了规格。布莱尔要到场，英方自然难以再生波折。马振岗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立即报回了国内。英方的一个小举动也证明了马振岗的预测是正确的。当天晚上，首相办公室给使馆打电话，说首相今晚给马大使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马大使有没有注意到。第二天一早，英国外交部又打来电话，说昨天首相见马大使时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是否已向中国国内报告。两次电话证明布莱尔在酒会上的表态并非无心之谈，而是思虑良久、有意为之。

能够在香港回归前摸清楚英方的态度让马振岗安心不少，他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不是担心发生变化而是着手准备香港回归的相关事宜。

对香港回归中国，不少英国人是通情达理的，一些有经商利益的企业界人士，也希望中英两国解决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拓展与中国的关系。但许多人心感“惋惜”却又无可奈何。在一次宴会交谈中，一位女士向马振岗说出了自己的心情。她说，自己很明白，香港是中国的，应该归还，但心情却难以舒畅。这就好像一座漂亮的房子，我们在里面住了100多年，对房子已有深厚感情，现要交还给它的主人，心里总有些舍不得。马振岗说，她的感受反映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境。这种情况，在两场不同的招待会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1997年6月30日晚12点（北京时间），伦敦时间是当天下午4点，英国在外交部举办了香港回

归的招待会。与会者有100多人，主要是英国政府官员和与香港有关的各界人物代表。招待会开始，大屏幕上播放BBC现场直播的香港回归仪式场面。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徐徐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英方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而中方人员故作镇定，内心却无比的激动。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看完交接仪式后，是中英双方代表讲话，英国代表是副相普雷斯科特，中方代表自然是中国大使。由于是临时决定，马振岗需要即席演讲。普雷斯科特副首相走上前台，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照着稿子严肃地宣读起来。马振岗一面认真听着他的讲话，一面抓紧时间组织思路。幸好这些日子他已多次被邀做报告，对有关香港的情况和政策都挺熟悉。轮到他讲话时，他按想好的思路即席讲了四点。首先祝贺香港政权顺利完成交接，这是中英以合作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创举，双方都应珍惜这一成果；接着重申了我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充满信心；第三强调香港回归是中国朝国家完全统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后表示相信中英关系将出现崭新开端。许多英国朋友对马振岗的讲话表示赞赏，他算是通过了这次考验。

当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也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招待会。中方的招待会和英方的招待会气氛完全不一样。英方的感觉像是个大冰窖，而中方的完完全全是个大火炉。来自英国各地的华人华侨、留学人员、中国在英公司企业、新闻媒体代表五百多人欢聚一堂，共同欢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招待会开始，重放了中央电视台的香港政权



图5 1997年7月1日驻英使馆党委共同高歌欢庆香港回归，左起第五位为马振岗

交接仪式的直播片段,当看到祖国国旗升起的场面,大家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之后,大家争先恐后讲话,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在英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用精彩的演出抒发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灼热情感,招待会一直延续到夜深。这夜,马振岗激动难眠,感慨中写下一首小词纪念:

“金瓯失南陲,云黯雨菲,刀剑难敌炮舰威。千载古国任割裂,江河含悲。明珠今荣归,天朗日辉,骨肉团聚热泪垂。风起云涌势变矣,巨龙腾飞。”

香港回归第二年,马振岗特地去了趟香港,亲身观察一下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欢欣鼓舞,更加体会到“一国两制”思想的伟大价值与深远意义。香港回归十多年来的发展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成功的和正确的。香港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国际上少数人悲观或别有用心地预言。马振岗深信香港会越来越美好。

女王陛下亲莅临

1875年,清政府租赁下英国伦敦波特兰大街49-51号的楼房作为驻英公使馆,郭嵩焘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后到达这里,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成为了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位公使。从此,那里一直是中国使馆的所在地,从未改变。但是在120多年间,英国换了六代君主,却从无一任莅临过这座楼房。马振岗谦虚地说:“我这个大使可能不是特别有能力的大使,但是个非常有运气的大使。因为在我这一任中,经历过好多大的事件。除去香港回归,还有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女王受邀参加主席的答谢宴。这是120年来,英国女王第一次进入中国使馆大门。”

自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间没有大的分歧,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先有朱镕基总理顺利访问英国,后有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中英间贸易往来日趋活跃,两国合作的领域和前景十分广阔。

中英关系在1999年秋再次出现新高潮。当年10月18日,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坐专机到达伦敦,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对英国女王1986年访华的回访。江泽民主席是我国第一位访问英国的国家元首。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使馆严重毁坏。北约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中国与英国及其盟国的关系也陷于紧张状态。江泽民访英表明,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解决后,中国并不想因此影响了中英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此次访问就是想让中英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英方也高度重视江泽民的这次访问,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香港回归,中国履行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中英高层交往将有益于香港。

18日,江泽民主席乘坐的专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徐徐降落。随后,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走下舷梯,同前来迎接的英国女王代表、英方陪同团团长法林顿勋爵等亲切握手,互致问候。马振岗和夫人陈小东及使馆部分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迎接主席。

19日中午,英国女王在伦敦的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晚上又在白金汉宫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女王和主席先后致辞,表示希望两国不断增强友好合作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

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般不举行答谢宴会,但为了尊重英方的习惯,江主席同意为女王举行答谢宴会。这样一来,举办宴会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使馆身上。马振岗和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既兴奋又紧张,英国女王到中国使馆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这是以江主席的名义举行的答谢宴会,必须十全十美,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次宴请是开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菜肴和餐具都需要非常讲究。正当马振岗为难之际,大使馆三名厨师自告奋勇承担重任。马振岗记得头道菜是浇汁鲍鱼,每只鲍鱼都要切成互连的薄片,一百多份,一只只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三位厨师说,能够为主席和女王做菜,是荣幸,再苦再累也值!

晚上7点钟,江主席的车队准时到达。马振岗把主席夫妇接到一层中国厅,等候女王伉俪来临。中国厅里摆放着很多珍贵文物,正当马振岗向主席介绍时,有同志报告说女王马上到。

马振岗赶紧出门迎接,只见女王和她丈夫菲利普亲王已经下了车。女王身穿白色套装,带着银白的珍珠项链,优雅不失庄重。此时,江主席夫妇已经在中国厅门口等候。中英两位国家元首互相握手,互致问候。接着,他们一起步入客厅。刚一进门,

客人“唰”的一下全体起身，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元首。

菜上两道，酒过三巡，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江主席邀请议长布思劳伊德，用英语合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首上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马振岗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给主席和议长伴奏，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女王平时给人的印象稳重而端庄，这时却开怀大笑，乐得前俯后仰，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宴会快结束时，全场的英国客人起立，唱起传统英国民歌《因为他是一个好伙伴》（As He Is a Jolly Good Fellow），整个宴会厅一片欢歌笑语。

这次宴会很快成为伦敦社交场合的一段佳话。有一位大使还悄悄问马振岗：“你用什么办法把女王请到了大使馆？太不可思议了。”女王后来也对马振岗说：“我参加过数以千计的宴会，江主席那次宴会是我感到最愉快的一次。江主席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国家领导人。”

马振岗说，遗憾的是，王室严格规定不得拍照，因而没能留下任何留影纪念，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英伦风情多趣事

三十年前在英国留学，生活单调，经济拮据，思想郁闷，马振岗一心想多学点知识，不辜负国家的栽培。三十年后在英国当大使，重任在肩，社交频繁，折冲樽俎，马振岗一心想推动中英关系，不辜负国家的信任。一朝青涩学子，一朝魅力大使。三十年时间酝酿了一坛好酒，一旦开封则香飘四溢。

马振岗说，外交说到底是在做“人”的工作，合格的外交官要懂得怎么与人交往，想方设法多交、深交朋友。不管部大臣曼德尔森是首相布莱尔的亲信，后来改任要职工大臣。他曾借钱买了一栋房子，没向工党报告，有人借此做文章，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辞职后，他低沉了一段时间。马振岗感到他会“东山再起”，便继续同他保持往来。在邀请他来使馆吃饭时，马振岗赠送他自己手书的一幅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并附上亲自做的翻译。曼德森看后，激动地说，“马大使，你写的就是我啊！”马振岗一次宴请撒切尔夫人的前安全外交顾问鲍威尔时，鲍威尔夫人问他：“马大使，你给曼德森写

了什么东西？他那么高兴，还把字它挂在卧室里面呢。”后来，马振岗在招待会上遇到曼德尔森，敦促他抓紧时间访华：“我估计你又要会忙起来。”此后不久，马振岗陪外贸部部长石广生去见布莱尔，布莱尔笑着对他说：“马大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又要启用你的好朋友曼德尔森了。”次日，曼德尔森被公布出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曼德尔森至今不忘此事。

“合格的外交官，应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在英国，别人把你当成中国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大家又把你当成英国百科全书。”马振岗语重心长地说。但一个中国人了解英国毕竟有限度，遇到这种情况，马振岗经常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的知识来转圜。有一次，马振岗受邀与英国知名人士一起看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专场演出，他虽对莎翁作品不全陌生，但毕竟不是对每部著作都了如指掌。这种专场演出中间休息时间较长，用来进餐。在饭桌上，大家不免谈论一番，并请马振岗发表看法。马振岗谈完对莎翁作品的理解后紧接着说：“早在莎士比亚250多年前，中国也出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其中最杰出的是关汉卿。”接着，他详细地介绍起关汉卿名剧《窦娥冤》的剧情，讲到窦娥在被处死前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飘雪、大旱三年时，周围人都听得入了迷。几位夫人还纷纷索要这个剧本，说要仔细拜读。

介绍中国，也要讲究技巧，有针对性。有一次春节前，马振岗应邀到一所小学做报告。面对一群不满十岁的小学生，大谈政治、经济肯定不会引起小孩子的兴趣。马振岗便从春节讲起，介绍过春节的习俗，由春节讲到中国的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由端午节赛龙舟讲到屈原，从屈原讲到中国的文学艺术，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他一口气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小孩子们都听到如痴如醉，居然没有一个人离开，连许多老师都加入了听众行列。校长兴奋地说：“马大使，你讲得太好啦。这么长时间孩子们都一动不动，都听得入迷了。”还有一次，马振岗给一些曾与中国有过交往的退休老人做报告。他从中国家庭的“三大件”变化讲起，讲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后谈到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就，效果也非常好。

在外交场合，什么事都会突然发生，因此需要平时多积累，事先多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

马振岗有一次被邀参加一位意大利古典作曲家的音乐会，演出的是一部关于耶稣遇难后走向天国的作品，这是一部很少演奏的作品。马振岗事先查阅这位音乐家资料，知道他习惯写耶稣遇难一类主题，调子通常都比较低沉悲哀。果然，吃饭时就有人问起他来，马振岗根据所读谈了自己的看法，不少人点头称是。“中国是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中国的外交官决不能被人看成缺乏文化修养的莽汉。”这是他的深切感受。

英国的点点滴滴，马振岗都记在了心里。外行看外交官，觉得很神秘，其实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所要具备的素质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找到，只要把小事做好，从小事中也能够汲取到做大事的营养。

看今朝云卷云舒

回首过去，马振岗对英国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这种情感恰好能够用一幅对联来表达：上联——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留学英国；下联——历经锤炼，成熟稳重，驻英大使；横批——难忘英伦。

英文中有一个习惯语——知道自己的面包哪一边涂着黄油（know which side one's bread is buttered），意思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马振岗认为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英国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传统上，英国人重实务，重利益，颇为精明。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英国人的对外政策上。

中英关系从香港回归后，平稳发展了十几年。东方巨龙的腾飞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英国也不例外。戴维·卡梅伦当上英国首相以来，基本延续了工党的对华政策。2010年11月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就任半年后首次访华，带来一个庞大而豪华的阵容，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能源、教育和商业4位内阁大臣和约50位英国工商界顶尖人士。卡梅伦访问前对媒体表示，他此行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商贸之旅”，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2012年，卡梅伦不顾中方反对会见窜访英国的达赖，对中英关系造成了损害。马振岗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中英友好发展基本趋势不会根本改变。

马振岗现已退休，但仍是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最近又出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依然忙个不休。问他为什么还把自己

搞得这么忙，他豪爽地笑着说：“老头儿嘛，忙一点也有好处，忙起来就会觉得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事。再说，参加些研讨会，写写稿子，接受些采访，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谈及自己的家人，马振岗很骄傲。他与妻子在北外相遇相知，妻子的理解与支持永远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夫妻俩育有一子，因外交工作夫唱妇随，时常不在国内，只好把孩子送往寄宿学校。远离父母，儿子十分懂事争气，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已成为一名律师。

马振岗那一代人，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国家需要自己到哪里去，就义无反顾地到哪里，就像是一颗螺丝钉，拧到那里都尽职尽责。他们感谢祖国给予的一次次机会，能利用这些平台施展拳脚，发挥自己的作用，报答祖国和人民的栽培。马振岗说，他只是国家外交队伍中平凡的一员。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外交官们在搏击国际风云的一生中演绎出了不平凡的戏剧。

墨迹无声，留下的是一种沉默的力量，在岁月的步履中逐渐沉淀。

（本文摘自《师出北外 声传世界》一书，作者：李洋）

一路兼程，一路花雨

——访邵俊阳校友



人物简介：

邵俊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1997 级校友。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欧洲商学院博士，是一名资深投资人。自 2016 年起加入德国复星集团，现任复星时尚集团董事总经理，常驻法兰克福，同时担任奥地利上市公司 Wolford 监事会主席、德国上市公司 Tom Tailor 监事会成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德国校友会会长。

“你好，我是邵俊阳。”耳机里传来校友温柔的声音，因为地域原因，此次采访是通过微信语音电话的形式进行的。采访时已是晚上九点过半，刚刚结束电话会议的校友依然耐心而热情的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1997 年，邵俊阳来到北外，在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北外时，她如是说：“当时语言类是比较火的，而我自身也对语言文学类专业非常的感兴趣，再加上父母也认为女孩子学语言比较有优势，会比较好就业。”因此，高考后的邵俊阳选择了北外这一国内顶尖的语言类高校，成为北外德语系的一名学生，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德语学习。

“语言就是要扎扎实实的学。北外是一个学风极为浓厚的学校，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而德语本身就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语言，也许是在学习德国的语言文化过程中受了其民族勤奋努力的特性影响，当时同学们都很努力，图书馆占座，大教室也占座，早晨早读背诵，总之非常刻苦。”回忆起当年在校学习的情景，邵俊阳十分形象地为我们再现了当时德语系同学勤奋努力的场景，观之现在，当时她经历过的占座、晨读，仍是现在每一个北外人学习生活中的一部分，刻苦是北外的一种传统，代代相传，经久不息。

当四年的本科学习结束后，邵俊阳认为，语言只是作为认识新事物的一种工具，在学完语言之后，应该再学一门专业。由于自身对经济类专业的兴趣加之本科期间辅修了经济，有一定的基础，邵俊阳选择了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经济类的研究生做进一步的深造。

由于当时德国并不承认中国学生的本科学位，邵俊阳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相当于是从头开始的，但扎实的语言基础使得邵俊阳在德国的求学经历变得顺利了许多。“因为没有语言障碍，我的留学生活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语言底子好对我的学业帮助特别大，甚至提前两个学年完成了全部学业。”邵俊阳如是说。同时，语言优势带来的顺利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它带给邵俊阳很大的自信。她说：“人在对自己有信心时，自我发挥会更好，有时我甚至觉得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没有在北外时压力那么大，那时我十分自信，心态非常的积极乐观。”从她的话语中，笔者仿佛能窥见当时那个操着一口不输当地人的流利德语的邵俊阳，自信乐观，意气风发的在德国大学的课堂上，校园里，神采飞扬，挥洒青春。那一定是一段十分美好，值得回味的时光。

从北外毕业，到提前完成哥廷根大学的学业再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到以最高成绩获得欧洲商学院博士学位，邵俊阳就是学霸的代名词。

博士毕业后的邵俊阳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和迷茫：接下来该怎么走？进企业还是继续做研究。因为当时还年轻，她便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了留校做研究，在留校的两年里，她参与了一些项目研究，最终觉得不是特别感兴趣，两年后，便离开学校进入了社会。

邵俊阳的工作履历也是让人艳羡的。在四大做过战略咨询，在投行做过顾问，之后进入复星，做股权投资。这种工作需要的是耐心、细致和谨慎。而邵俊阳更是将这些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步入高层。谈及这么多年来做投资工作的感受，她笑了笑说：“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经常出差，非常非常忙。但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会接触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而且随着做的越来越好，接触的也都是一些精英阶层，在交流和博弈的过程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在这种大环境里，对自我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邵俊阳现任北外德国校友会会长，谈到德国校友会，邵俊阳这样说到：“当时觉得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了，就希望大家能聚集在一起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并建立信息交流的平台，给校友提供一些帮助，使有困难的校友互相帮助和交流，这样有利于校友们凝聚和团结起来。”北外德国校友会成立至今，已经举办了一些金融领域、投资领域的校友座谈，四大的一些年轻校友举行了圆桌座谈，有经验的校友开展工作经验上的交流和分享，为年轻校友就业上的一些问题提供指导。在一些节日里，校友会组织校友在一起聚会，庆祝节日。北外德国校友会更像是北外人在德国的一个家，就像那句我们都知道的话：世界上凡是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北外校友的身影。由于北外自身的特色，校友的分布范围非常广，不同地区的校友会正是不同地区北外人的家。

说到母校对自己的影响，邵俊阳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之情，她说：“北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久性的，在北外打下的语言基础是我这么多年来在外求学自信心和成就感的来源，而这一切都是从北外开始的。北外真的是很让人骄傲的母校。”

采访的最后，邵俊阳就人生规划和海外留学为学弟学妹们提出了如下经验：“人生的每一步都要

踏踏实实地走，不用急着去规划什么，因为往往事情不会按着你当初规划的那样去发展，路都是走出来的。在每个人生阶段做不同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有准备的人自然会有路走。一定要对自己负责。至于海外留学，并不是说留学和留在国内哪个比较好，海外留学只是给自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而每一种生活的可能也都是有好有坏的，像我在国外的时候也会想念父母，也要勤工俭学。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带给我太强烈的缺失感。我认为年轻就应该出去走走，以开阔眼界和拓宽视野。要知道，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种财富是不能以结果为导向的，它的价值是无法以结果的好坏去估量的。”

“不好高骛远，而关注于眼前积累。”是邵俊阳反复强调的，而她本人也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者。一路勤恳踏实，努力不懈，才便有如今傲人的成就。正如汪国真先生曾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既然不甘平凡想要有所成就，便应该一路兼程，相信终会收获一路花雨。

(文 / 王雨轩)

人生就是要突破自己，影响更多人

——访张莉校友



人物简介：

张莉，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2000 级校友，同济大学 MBA。现任上海伊尔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

求学时代，她不断突破自我，从文科专业到商学院，在瞄准国内的环境产业后，她又从商学院到工科，从零开始读“城市与环境”专业，学成回国后创立了伊尔康公司。作为北外校友中自主创业的杰出代表，她带领伊尔康不断成长，业务点从 1 个增至全国 20 个，此时的伊尔庚正在筹备 A 股上市。

走访团队拜访张莉校友时，第一印象是她亲切随和，完全没有给人一种公司总裁的距离感。整个采访过程轻松愉快，她也将人生轨迹向我们娓娓道来。

张莉 2000 年进入北外英语学院，毕业后加入一家德企做总经理秘书，这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工业清洗设备供应商。由于表现优秀，仅用六年，27 岁的她就从总经理秘书升任公司副总。她既没有光鲜的留学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却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让人深深地佩服，也由此看出她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同时，在职期间，她顺利取得了同济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为了开拓事业的发展的新阶段，她决定辞去这份稳定的工作，远赴意大利学习。她又从零开始读“城市与环境”专业。求学中，她看到国内愈发重视环

境保护，坚信环境产业在未来一定大有可为。于是 2011 年，学成回国的她申请到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同济分基金第九批的资助基金，在 2012 年，上海伊尔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尔庚”）成立，并入驻了同济孵化器。2014 年，张莉带着伊尔庚代表同济获得“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赛金奖，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全国八强的女性，PK 掉当时张旭豪的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饿了么团队)。在问到公司名字的来历，张莉笑着说，Jokoson 是拉丁语“圣洁的水”之意。

创业初期，订单都是张莉一个个上门拜访所得。五年过去，伊尔庚凭借技术实力，先后为烟草、电力、化工、食品加工、航天航空、制药、精密加工、机场、市政等行业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业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伊尔庚是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科委和同济大学共同支持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目前拥有企业博士后、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及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发明、软件著作权，系科技部小巨人企业。作为国内首家工业环境服务提供商，伊尔庚根据客户现场情况为客户量身订做专业环境解决方案，整体解决从地面到高空；从气体、固体到液体的环境污染问题，包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含土壤、粉尘、液体、气体、综合噪音和工业固废等环境污染问题。在经营理念上，张莉也坚持用百分之五十的时间与客户沟通，因为她相信客户的诉求才是研发创新最大的动力。伊尔庚不仅有先进的技术，也有良好的客户和政府关系。伊尔庚在不断成长中，业务点从1个增至全国20个，同时设立了全国五家分公司，抓住一带一路的大好时机，公司在海外设立了办事处，此时的伊尔庚正在筹备A股上市。

张莉说，在外企上班的时候很不理解老板们的工作热情，而她成为公司负责人的时候才体会到，身上的责任之大，即使生病的时候也要坚持工作，因为她要对公司全部员工负责。幸运的是，张莉也是一个开明直爽的老板，公司气氛平等融洽，尽量减少员工之间的等级隔阂。

刚毕业的时候，张莉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成功人士，而创业后的她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成功的创业者关心的不再只是自己的幸福和财富，他们也在为整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每一步都脚踏实地，不断寻求突破自己的途径，从未停止学习和充电。

（本文转自“北外上海校友会”微信公众号，文：张素霄，采访：张素霄 潘云霄 王肇阳）

归来仍是少年

——访徐喆校友



人物简介：

徐喆，我校欧语学院捷克语专业2001级校友。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05年进入中国外文局工作，曾任国际合作部副处长，外事处负责人。现任北京大米未来科技有限公司（VIPKID在线少儿英语）CEO特别助理，党支部书记。社会兼职为北京环球英才交流促进会特聘专家。

夏日的午后有些闷热，徐喆背着黑色公文包，步伐矫健。待他走近，蓝色商务衬衫已经被汗水打湿。他微笑着向笔者打着招呼，声音浑厚悦耳。在北外酷浪咖啡厅坐下，他那自信的眼神让人印象深刻。

“采访提纲我仔细看过了，很开心能够接受采访，感谢母校的信任。”徐喆脸上依旧挂着温和谦虚的微笑，“那我就照着提纲说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提问。”眼前的徐喆俨然一副阳光大男孩的模样，朋友圈里的他几乎每天坚持5公里打卡，“自律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在配文的最后，他总是这样结尾。

2001年考入北外捷克语专业的徐喆，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难掩语气中的怀念和兴奋。“那个时候的条件不比现在，篮球场铺的还是土，每次打球跑起来的时候都能扬起满场的沙尘。图书馆比这会儿简陋多了。现在我经常回学校和原来的同学一起打球，学校大变样，硬件、环境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你们这一代很幸福。”大学时期，徐喆并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课学习，他积极报名各种学校社团，参加了很多学生活动，并曾担任欧语系的学生会主席。“低

年级的时候在辩论队锻炼过，那个时候何炅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当时还接受过何老师的指导。四年中差不多一直坚持着的是合唱团，我是低声部的声部长。”徐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每年的‘T风暴’模特队我也都参加，大学时候我应该还算挺帅的。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才开始办这些校园活动，没想到一直传承到现在。”

本科毕业之后，徐喆进入中国外文局工作，工作期间考取了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所以考研，是因为走向岗位后觉得还是应该多学一点东西。”谈起语言类专业跨专业考研的问题，徐喆说：“本科期间养成的学习能力对我考研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外语就是在不断学习新东西，这种对新事物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对我考研接触一个全新领域时作用明显。”在外文局工作期间，徐喆曾担任过中国外文局国际合作部副处长和外事处负责人。外文局的工作很辛苦，加班熬夜是常有的事，外宾接待工作更是复杂繁琐，需要注重细节。但正是这样严格的高压工作给了年轻的徐喆很好的锻炼，使其在日后的工作道路上受益良多。徐喆曾作为中央机关扶贫干

校友风采 EMINENT ALUMNI

部去山西左权县任外事办主任兼政府办副主任挂职锻炼,谈起这段基层扶贫工作经历,他感慨颇深:“只有深入到基层去,才能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情,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我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有机会应当再去实践的。”当时作为中国外文局外宣系统最年轻的外事处处长之一,徐喆曾多次参与对外宣传领域的重要项目。他曾参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发行,以及配合其高级访问活动的有关工作。徐喆还入选了中国外文局首批“青年英才计划”,获得中国外文局2015年“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获得公务员考核优秀嘉奖。

2017年,徐喆加入了VIPKID大米科技,担任VIPKID在线少儿英语党支部书记、兼任首席执行官米雯娟的特别助理。“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对于工作的改变并没有太多担心,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在不断寻找自己成长的新方向。在一次次的‘创新’中,生命的价值也在不断地丰满。勇于‘破界’,人生会变得更有意义。”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徐喆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观点。“不仅要精通本国文化,了解外国文化,还得掌握‘讲故事’的方式方法。用对象国能够接受的讲述方式让他们乐意了解我们的故事。”

“青年还是应该把命运担当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的,择业就业时个人前途是一个考虑方面,但也要想到为国家社会做贡献。”在采访的最后,徐喆给了学弟学妹们这样的建议。“一直以来,北外人的身上都有一种传承,一种印记,就像校歌里头唱的那样,‘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种品质我们应当传承,并且要一代一代地发扬光大。”

走出咖啡厅时太阳已是微微西斜,徐喆微笑着向笔者挥手道别,而后转身踏上来时的路。阳光透过斑驳树影洒落在他的肩头,走在三三两两谈笑的学生之间,他仍然像个少年。

(文/王楠)

从延安到联合国

凌青



作者简介：

凌青，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4年曾在延安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学习。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欧美司负责人，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四次担任安理会主席，第35届至39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后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

从爱国者到革命者

我是林则徐的第五代孙，1923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林步随是清末翰林，被清政府派去美国当留学生的督学，并在美国上了大学。因此，父亲是有中西文化背景的人，要求自己的孩子把中英文都要学好。

我在北平男二中念书时，“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我也随大流参加了。1938年我考入北平男四中。这时在北平常能看到日本兵在大街上列队行进，这深深地刺痛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这个时期，我看了哥哥的朋友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一大箱进步书籍，其中有鲁迅、巴金和苏联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河上肇的经济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进步杂志《美亚》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籍，它们对我的思想起了启蒙作用。也因受大哥的革命思想影响，我开始认识到，要改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命运，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要救国要革命就要找共产党。

当时，我认识了几个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如

俞林等。在我考入燕大之后，俞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兄姊五人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日军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开进了燕大，并开始抓人。燕大关门，我和我的姐姐于1942年7月，随党组织的一位同志仓促离开了家，一路上受到日本宪兵的多次查问。我们过了许多道日本封锁线，到达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满城，最后到了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为了不让北平家人受到日本人的迫害，组织要我们改名，我把原名“林墨卿”改成“凌青”，我的姐姐原名“林锦双”，这时也改名为“傅秀”，跟我母亲姓了。

在阜平，我们遇到了日本军队的扫荡，被“坚壁”起来，即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之后，我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任干事。1942年和1943年是军区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不但经常吃不上粮食，还要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

1944年4月，根据中央的命令，调我们一批干部到延安去。在路上，我们走了三个月，历尽艰苦，于7月到了延安——我向往的革命圣地。

在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

我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的，到了延安就归军委系统管。总政组织部长是胡耀邦。当时正好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为了做美方工作，中央很需要一些懂英文的干部，因此总政组织部一位管分配干部工作的同志就对我说，你在燕京大学念过，大概也还懂一些英文吧。美军观察组需要人，到那边去吧。我说，英文啊，懂一些，但基础不够，参加革命以后，又全都丢了。这样，他就分配我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去复习三个月，同时到美军观察组实习。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是曾涌泉（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英文系主任是浦化人（后来一直主持延安、张家口和进城后的外语学校），教员有马牧鸣（后任我国驻西班牙大使），还有英国人林迈可、美国人马海德和印尼人王大才等。林迈可是英国爵士，曾任燕京大学教授。马海德是同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外国医生，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王大才是印度尼西亚人，取了个中国人的名字，早先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后来从共产国际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回了印尼，以后下落不明。王大才在共产国际呆了很久，所以英文还可以。

组织部门的决定不仅改变了我今后整个革命生涯的旅程，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使我光荣地成为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元老”之一。尤其是，这项安排还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很多领导同志。不用说入党几年，即使入党十几二十年的老同志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1946年，黄华和柯柏年等领导调北平调部，我有机会在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杨尚昆当时是中央一级的领导人，又参加过大革命，而我只是入党才几年的青年，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更是难得的机遇。我在和他的相处中，从来不感觉有什么“拘谨”或“不自然”。他那种关心干部、宽厚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从中受到不少教益。

我接受组织决定后，就到延安军委总部王家坪附近山沟的外语学校去报到，见到了英文系主任浦化人。我们称他为“浦老”，因为他当时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浦老和蔼可亲，是一位长辈，英

语纯熟。过去做过传教士，是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据说担任过周恩来副主席最早的英文翻译。我到校后，经过测试，被分到A班。当时英文系设有A、B、C三个班，A班只有十一二人，和我同班而后来又到外交部的有曾远辉、郭戈奇、张林生等同志。郭戈奇后来到了教育部门工作去了。

我在英文系学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也到延安对面的美军观察组实习过。1945年1月，我就正式离开学校，成为当时中央军委外事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

中央军委外事组是中国共产党办理“半官方外交”的最早外事机构，名义上由军队出面，实际是党中央的重要机构。

1944年7月，为了适应美军观察组（之前还有外国记者团来访）访问延安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军委下设外事组，负责对美军观察组的联络、接待任务。美军观察组的对应单位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参谋长是叶剑英，而杨尚昆当时又正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因此，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和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提议，外事组由杨尚昆兼任组长。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而我们虽不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但有广大的解放区、红色政权和自己的军队，政、军都是独立于国民党重庆中央政权的，因此双方的关系自然就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延安外事组成立后，1944年8月18日，周恩来还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并发往各中央局，指示指出：这是外交工作的开始。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的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是党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它对以后外交干部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军委外事组成立的时候我不在，成立以后我才去。外事组的干部柯柏年、黄华、陈家康、杨作材和我就住在观察组的大院里。

外事组除设组长、副组长（后改称主任、副主任）外，还有顾问一人，就是马海德。下面设有四个科：第一科是联络科，科长是陈家康；第二科是研究科，

科长是柯柏年；第三科是翻译科，科长是黄华；第四科是行政科，科长是杨作材。不久，陈家康调回重庆，联络科长由黄华兼任。黄华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老一代领导干部中少有的懂英语的人才，又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好朋友。斯诺在陕北采访时，他帮助做翻译，而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的材料，也多是在他协助下完成的。由黄华领导当时外事组的联络和翻译工作是最佳的选择。柯柏年因年龄偏大（时约四十多岁），我们就称他为“柯老”。他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马列主义功底比较好。到外事组前，柯老曾在中共中央研究院工作，并曾在延安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他着重研究美国问题。我所接触的领导同志只有杨尚昆主任和黄华、柯柏年、杨作材、钟庆发等老同志，其中，黄华、柯柏年解放后都留在外交部，杨作材则做过建材工业部副部长，钟庆发做过中侨委副主任。

我从1945年1月到延安军委外事组，至1947年3月将美军观察组人员从延安送走，前后和美军官兵相处两年多。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早在1942年，领导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就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有不少交往，建议他们去延安看看。但美国官方人士到延安来，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善意邀请就能做到的，所以，他们迟迟不能成行。

直到1944年，国际形势已处在转折关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望，但同盟国与法西斯势力仍需最后一搏。战后新的战略格局已露雏形，强国只剩下美、苏、英三国，如何应对这个新的格局，也要求有新的战略决断和对策。美国派遣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

1944年6月23日，美军准将福瑞斯正式致函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允许美军观察组赴延安。6月24日，我方答复同意。随后，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延安。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乘美国空军C-45运输机飞抵延安。第二批成员在8月7日到达。观察组成员18名，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军。其中两人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官衔为二等秘书，即约翰·S.谢伟思和雷蒙德·P.卢登，其他都是情报官员和技术服务人员，包括情报军官、医务人员、气象人员、无线电台报务员、



1946年凌青陪同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多种机修人员等。

观察组一行人到延安机场时，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都到机场迎接，并设宴为他们洗尘。宴会上，我们也有面包、果酱、牛奶、牛排、鸡蛋等，客人们很高兴，备感意外。观察组成员住下后，就同我方举行座谈。叶剑英谈全面战场情况，彭德怀谈华北战场，陈毅和聂荣臻分别介绍新四军和晋察冀根据地情况。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还不拘形式地同他们长谈多次，这些谈话都由黄华、陈家康、柯柏年等担任翻译。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派员到晋绥、晋察冀根据地考察过。

我们很重视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社论，最初的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后毛主席又给加了“战友们”三个字，改成《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毛主席还给一名美国军官，即观察组改名为联络组时的代组长——杨照辉少校写了“战友之谊”的题字，作为纪念。有时毛主席去机场接人，我也曾担任翻译。

获取有关日军和我方情况的各种资料

搜集情报应该是观察组的首要任务。观察组情报官来自不同的情报部门，有属于战略情报部门的，也有属于中缅印战区作战情报处的或军队情报局的。美国军官除了同我们延安总部的作战部经常联系外，还组织成员到我敌后考察。当然，这样的考察既有了解日军活动情况的一面，也有了解我军情况的另一面。也许后者更加重要。例如，观察组到延安不久，彼得金少校就率领数人离开延安去考察根据地，直到阜平县（晋察冀根据地总部），前后呆了几个月。据事后透露出来的情况，去前，包瑞德上校曾指示

彼得金，应观察“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他们的身体情况、食物、衣服、士气的潜能，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断有多少是分别来自国民党政府拨发的，来自敌军和友军的，有多少是自己制造的，需要对共产党抗日的力度、突击能力和缺点做出大体评估，需要观察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力做一个判断，并希望能带回一些共产党的报纸和刊物”。彼得金一行是很艰苦的，他们大多时间骑在骡子上，也有步行的时候。我们派了1200—1500人左右的军队护行，并在阜平设圣诞节晚宴，招待美军过节。

美国军官也很注意从日本战俘中搜集情况，如观察组成员曾经和当时在延安的日本战俘约一百五十人接触过。埃默逊和有吉辛治是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专门被派来延安了解战俘情况的。埃默逊懂日文，有吉更不用说了。这些战俘当时都已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二次大战后名野坂参三）领导下学习。据美国军官反映，这些战俘大部分是农民，公开谴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认为日本国内局势恶劣，人民吃不饱饭，日本必然战败。美国军官根据日本战俘的反映，编写了针对日军心理状态的反战书，向日占区散发，有吉辛治就是专门负责心理战部门事宜的。

美国政要访问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应该算是赫尔利和马歇尔的访问了。赫尔利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分别来访两次，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第二次则是以美国驻中国大使身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来访前曾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来访时也是以总统特使身份，回国后接任国务卿。两位美国高官亲自访问延安，充分折射出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即使在当时也是这样。

马歇尔访问延安与赫尔利访问延安有着不同的时局背景。赫尔利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抗战还在进行时发生的，当时美国政策是争取国共两党取得一定和解，以有利于美军对日的最后一搏。马歇尔访华则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还远在西南部大后方，需要争取喘息时间，对军队重新部署，以便占据对付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有利地位，准备大打。

这时，和平谈判虽然仍在进行，但已只是幌子，掩盖国民党大规模备战的行动。

根据1945年《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都同意于1946年1月10日停火，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火。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上为三人小组，由马歇尔任主席，成员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和代表国民党的张治中。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郑介民，美方为华尔特·罗伯逊。军调处由大约一百五十名官员和成员组成，涵盖六个战场，下设六个工作组，主席都是美国人。军调部成立后，原延安外事组的黄华、柯柏年等骨干都随叶剑英调到北平了。

1946年初，马歇尔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中提出，希望和周恩来、张治中一起去华北视察。2月28日开始到3月3日，他们从重庆到北平，再到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济南、徐州、新乡、太原等地。3月4日下午16时，周恩来、马歇尔等一行人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马歇尔还检阅了延安的仪仗队。

马歇尔来调解国共纠纷，为了显示他公正，所以既到重庆去，也到延安来。他并不想跟我们真正谈什么问题，访问也是礼节性的，只是个姿态罢了。当然他来了，我们就得接待，而且还得认真接待，因为他是大人物啊，美国的五星上将，第一个访问中共延安总部的美国高级官员。

晚上19时，毛主席设宴招待马歇尔。接待的时候请马歇尔吃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清楚了。那时，延安虽然穷，还是有点东西的，肉是有的，鱼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宴会中还有海味，毛泽东对马歇尔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当时我们确实做了精心准备。接下来，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当然，也为中美人民友谊干杯。和毛主席、马歇尔同桌的有张治中、朱德、周恩来，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做翻译的是余光生（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做过铁道部副部长）和章文晋。晚宴后，举行了歌舞演出晚会，除了传统的打腰鼓等节目外，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马歇尔参观王家坪中央军委作战室时，十分感慨地说：“共产党领导一百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

毛泽东主席同外宾的几次谈话

谈话是在内战爆发后进行的。外宾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打下去的决心、力量和战争前景等，毛主席都从战略高度给予了坚定而明确的答复。

由于上述的特殊历史条件，我在延安时有幸做过毛主席的翻译。毛主席为多做外宾工作，一般只要外宾提出要求，毛主席又恰好有时间，就接见。

较重要的翻译有两次：一次是毛主席同斯蒂尔（A. Stelle）的谈话，另一次就是同罗德里克（J. Roodyrick）等几位记者一起谈的。斯蒂尔是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最有名的记者。谈话时间是在1946年9月29日，全文后来以《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主席这次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美国“调解”问题，他对斯蒂尔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做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同时毛主席还提出：“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这次谈话是在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下进行的，争取美国转变援蒋政策已无望，所以毛主席谈话口气直截了当。斯蒂尔听了毛主席的表态，连连说：“很清楚。”这次谈话还具有阶段性的战略意义，表明国共谈判阶段已经结束，全面内战开始，也表明我们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谈话同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第一次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连在一起，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如何揭穿帝国主义的嘴脸，动员人民、鼓舞士气、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还有一次是见英美记者数人。这是从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因为谈话中透露了一些政策信息。接见的地点就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内，接见的人中，有罗德里克、哈默等人。谈话是在1946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进行的，当时已是全面内战的局面，而且国民

党进攻并不顺利。从记者的提问中已可看出，他们并不再关注“美国调解”的作用，而是更加关心内战的前途，试探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打下去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底盘。

中共中央外事组为新中国的外交做了准备

如今有谁知道，晋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三交镇，曾是新中国外交部的“人才库”。由翻译、研究国际问题到参加土地改革，从多方面、多领域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干部。

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前夕，美军联络组撤出延安。延安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撤退。

我同马牧鸣、毛立青等同志一起背着行李、背包，从延安撤出，一直走到黄河边，夜渡黄河，继续随着中央队伍走，也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后来，走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朱总司令的警卫员李树槐（解放后任公安部局长）骑马赶过来，传达上面的指示，说是就地停下，不走了。我们就在三交镇附近住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一带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后方党委的驻地，党委书记是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担任副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都在陕北前线打仗，原延安中央机关中不需要留在陕北的，也都聚在了这里。

过了一个多月，记得是在1947年5月1日，叶剑英、王炳南把我们这些人找在一起，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和领导成员名单。外事组主任就由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是王炳南。王炳南是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协助周恩来搞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曾为我党统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外事组设顾问一人，是马海德。下面设三个处，即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研究处处长是柯柏年。当时没有副处长，1948年，张香山来任副处长。编译处处长是徐大年（解放后名徐永英）。徐大年是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唯一长期在美国工作，直至1947年延安撤退前才回国的党内有留美经验的同志。编译处副处长是章文晋。章文晋是周恩来同马歇尔谈判时的翻译和助手，英文好，工作作风细致认真。新闻处处长是董越千，他在晋察冀军区时曾给白求恩当过英文翻译。新中国外交界的重臣或元老级干部，如黄华、乔冠华、龚澎当时都没有在外事组。黄华随刘少奇和朱德的中央工作委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员会到晋察冀军区的阜平去了，后到西柏坡，续任朱总司令秘书。乔冠华、龚澎都留在香港工作，没有回来。另一元老陈家康代表中国青年组织到布拉格开会，也没有到外事组。

处下面设有科。研究处设两个科，第一科科长就是我，负责编《美国手册》；第二科科长是吴青（女）。吴青是燕京大学学生，较早加入共产党，后来代表中国去布拉格参加国际妇联的工作。吴青走后，由王朴继任科长。王朴英文好，抗战末期参加东江纵队工作。第二科负责编《供您参考》，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根据当时所获得的有限的外国报刊材料编写，由柯柏年主编。

编译处下只有一个科，科长是马牧鸣。该处负责翻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即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党》、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

当时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忙于打仗，实际上没有什么外事工作，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外事组呢？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办的。周恩来认为，这批干部有一些外事经验，也懂一点外文，可能成为新中国搞外交的骨干，不要走散了，以后不好找，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把他们保留下来。

我们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来的，包括柯柏年、王光美、董越千、刘华峰、王朴等同志；有从重庆、上海、南京回来的，如王炳南、章文晋等同志；有从延安出来的，如有我和马牧鸣等。外事组当时聚集了大约二三十名干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张香山解放后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徐大年后改名徐永英，解放后做过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后转抓中央编译工作，主持翻译毛选。章文晋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董越千解放后做过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驻瑞典大使。张颖（章文晋夫人）曾任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吴青后来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妇联工作。马牧鸣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尼泊尔、西班牙大使。陈应 20 世纪 60 年代任驻蒙古使馆参赞。刘华锋任中直党委副书记兼中办人事局长。陈浩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王凝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褚启元任驻津巴布韦大使。陈佩明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国际部主任。刘文仲任外交部档案室主任。孙少礼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赵颖任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

等等。

1948 年春，中央决定，外事组转移到以刘少奇和朱总司令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的驻地。因为这时战局已有较大变化，原在陕北坚持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也在向西柏坡行进之中。留在山西的后方党委准备取消。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建屏县一带。先到西柏坡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安排好驻地，大队人马就在离西柏坡不远的柏里村住下。王炳南在路上就向大家宣布我军已收复延安的消息，大家在极度兴奋的心情中，放下了行李。中央外事组就这样从晋西北转到西柏坡附近，一住又大约一年。战事发展越来越顺利，新中国的诞生已是指日可待了。

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

三年的解放战争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全国人民从此步入了独立和发展的道路。我国外交部成立后，我任美澳司美国科科长。

时光流转，一晃眼到了 1949 年的 1 月。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到西柏坡听周恩来的报告。王炳南就带着我们大家去了。周恩来给我们做了一次外事报告，可惜没有记录，但大体意思我还记得。

周恩来告诉我们：过几天，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该做好准备，前往天津，以后，你们要去接管天津外事工作。他首先分析了解放区战场的形势，提出原来我们估计要五年才能胜利，现在看起来不用这么长时间。周恩来这番话令大家都感到十分振奋。1946 年 7 月才开始大打起来，经过 1947 年、1948 年，到 1949 年初，才三年不到，原来估计要到 1952 年才可能获胜，没想到 1948 年底就形势大变了。

周恩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大体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外事政策方面。周恩来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主要是讲进城后的涉外问题。强调进城后，首先要稳定局势，涉外工作要为这一目的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并提到河北省献县天主教堂神父受保护，土改时，没有动他们的财产，表扬了这种做法。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其营业，但要接受

我们的管理。这些大的原则定下来，体现了在外交工作上的区别对待精神，在外交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初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规范了一些重大的方针性问题。第二部分是外事工作干部本身应注意的事项。周恩来当时特别强调纪律，外事干部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的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周恩来对干部的要求，以后发展为16个字的完整表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成为外事干部的基本守则，一直沿袭至今。

从西柏坡到天津，我们大家这次就不是用脚走路了，而是乘坐一辆大汽车，先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停了一夜，就从石家庄经过冀中大平原，一直开到天津郊外。一路上，大家都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也憧憬着未来的光辉前景。

我们到天津郊外时，天津刚刚解放。我们进了天津城后，住在天津的罗斯福饭店。罗斯福饭店现在可能没有了，也可能改了名。在罗斯福饭店住下来以后就进一步分工，一部分留在天津外侨事务处，黄华、章文晋、马牧鸣等人都留在天津了。黄华、章文晋分别是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正、副处长。但是没隔多久，黄华就离开了天津，调到南京，转任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也是燕京大学出身，他去南京，主要为的是联系解放前的美国末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方便，司徒雷登曾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有意访问北平，与中共接触。黄华走了以后，章文晋接任外侨事务处处长。章文晋后来又调到外交部。我没有到天津外侨事务处，而是继续随王炳南、柯柏年往北平走。我到北平郊外时，北平还没有解放，林彪大军正围着北平城，在和傅作义谈判。在郊外呆了一段时间后，北平解放了，我们进了城，还是在外事组，没解散，就住在和平门西松树胡同17号一栋四合院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王炳南召集会议，宣布解散中央外事组和新中国外交部科长以上干部名单。外交部成立的时候，司长的级别都是很高的，柯柏年是美澳司司长，伍修权是苏欧司司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王稼祥被任命后，实际上没在外交部上班，马上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章汉夫在上海当军管会外侨事务处

处长，因为当时刚解放，上海的情况还很复杂，在这个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好多西方的企业怎么处理，需要有个大员在那里亲自掌握，所以章汉夫就去了。实际上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李克农，但李克农本人又是党中央的总情报部部长，他的任务很重，所以更具体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王炳南做。外交部成立后，我担任了美澳司美国科的第一任科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外交部正式成立的日期也应该是这一天，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就已经明确声明：“但凡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各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周恩来总理又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致各国政府公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外交部成立时，干部只有248人。据统计，当时科长级以上干部是47人，一般干部201人。其中抗日战争或更早参加革命的有68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是180人；文化程度方面，留学生17人，大学生140人，两者合计占63%；懂外文的干部约140人，占56%，非外文干部108人，占44%。此后不久，又从部队调来一批将军，如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彭明治、王幼平等，担任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如同整个中国革命队伍一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成立大会由王炳南主持。在大会上讲话的领导有三人，就是周总理兼外长、李克农副部长和王炳南办公厅主任。

周总理即席做了长篇的发言，从外交路线、原则到外交工作特点、作风锻炼等，都讲了很多。这是周总理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对外交部干部做的第一篇报告。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强调：“要认清敌我，对帝国主义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凡是不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外交官地位，只把他们当外侨看待，犯了法，一样要法办。当然，也不要轻视帝国主义，不要盲目冲动，不要盲目排外。对帝国主义战略上反对，战术上个别问题仍可联合。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体系，目标一致，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要联合各兄弟国家、各国被压迫人民。当然，与兄弟国家联合，并不是说没有区别，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都有所不同，要认为

毫无问题，就是盲目乐观。”周总理还批评了接待苏联代表团时，中国同志扎堆坐在一起，不主动同外国朋友攀谈的现象。

周总理的讲话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几点：第一，区别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外交，他说：“中国一百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反动政府跪在地上办外交，我们不能这样，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第二，要重视外交上的具体斗争，要认真仔细，分析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外交不能乱搞，遇事要仔细想，属于哪一类性质，好的、坏的都要分析，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仅要记忆，还要多想，要多研究、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难做，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将军等，不是全面的外交。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要加倍谨慎。”第三，强调外交工作的纪律性，“要有严格纪律，一切都要预先请示，批准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一切事情在一定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缺点，但对外必须一致”。第四，重述当时外交部新同志较多的情况，强调要磨炼自己，指出“在座的大半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学生斗争经验，责任重大，要求每一个同志都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不要骄傲，不要气馁，必须磨炼自己”。第五，“军队斗争和外交斗争相似，外交人员就是文装的解放军”。周总理的这些话对于外交部以后工作的发展、干部的配置和成长、工作作风的培养和形成，都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积极影响。

从外交部成立到今天，58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外交早已从摇篮阶段进入成熟时期。中国外交队伍也早已从少数人发展到一支包括精兵强将的大队伍。中国外交早已摆脱旧中国的屈辱、投降的历史，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新中国外交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作为一名老外交战士，在看到今天的辉煌成就，回顾过去的创业历程时，真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兴奋。

板门店谈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美军进行了五次会战，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美国政府撤换了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议同我进行停战谈判。

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为团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但李、乔是幕后掌握，对外不出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式代表是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李克农带了我们懂英文的几个人：浦山、裘克安、毕季龙和我——他们几位都曾在哈佛、牛津等名校留过学，只有我是“土包子”。还有一个笔杆子，是新华社的丁明，也是老延安。我们这几个人是搞业务的，也有一些搞行政、机要、军事的干部。新华社派出了沈建图、段连成两名干将，英文都很好。联络官是柴成文。

我们去朝鲜前，先到李克农家里集合。李克农当时住在朝阳门内的一个四合院里。他对我们说：“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绝不低于敌人。我们既然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到了半夜，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坐火车先到丹东，傍晚的时候，改坐吉普车，跨过鸭绿江。

进入朝鲜后，看到了战争的惨烈。城市里一片瓦砾，乡村也多是断壁残垣，一路上坑坑洼洼，有的时候坐在汽车上，能把你颠得老高。美国飞机不断地在上面扔炸弹，连夜间行车也要冒很大风险。不过，司机有经验，美国飞机要是轰炸，先扔下照明弹，一个还不行，它得绕一圈，要扔好几个，然后整个地方才能照亮。你看它扔了第一个照明弹的时候，就赶快冲过去，冲出照明弹能够照亮的圈子，就没事了，因为它炸的地方是原先扔照明弹的那片土地，就炸不到我们了。因此，不管路有多颠，也得赶快跑。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是沾了还没有“精确制导炸弹”和“红外制导炸弹”的光。

初到朝鲜开城，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我和浦山住在一间屋，两张床，屋内不仅没有炉子，窗户还透风。冬天晚上睡觉，棉裤、棉袄不能脱，还得捂上棉被。吃得也很差。我多少还有过些艰苦生活的磨炼，浦山、裘克安、毕季龙等虽然初从国外回来，也都能克服困难，专心工作，并且成为骨干力量。

这一情况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有些进步青年虽然身在海外，但都怀有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愿望。李克农副部长是有全面领导经验的老同志，不仅抓业务，而且对机要联络、行政后勤、干部思想等也抓得紧。在同他接触过程中，一般干部都感到很亲切。他关心下属，宽厚待人，即使他的部下对他有不敬的地方，他也能宽容对待。在他亲自过问下，后勤保障逐步得到改善。到1952年初，生活条件就好些了。

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画上了句号。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最后转为停战委员会。停战协定签字只有10分钟，却开了575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可以说是马拉松式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一天，这一天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一生忘不了。这不仅因为它是停战谈判代表团全体同志长期辛勤劳动所得到的胜利果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签字后对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朝鲜的这段特殊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财富。我没有怎么在第一线，做的工作不多，但也身历其境，了解了整个发展过程。停战谈判同一般外交工作比较，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是指都是外交工作，特性是指它与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斗争的形式和方式往往同普通的外交斗争不一样。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工作。但我希望，我的后辈们今后不会再有像我在朝鲜这样的特殊经历。



1955年凌青、张联在罗马尼亚

1953年，从板门店回来以后，我遇到了满洲里外事处的干部张联，她才貌双全，有事业心，我们相爱并结婚。张联后来凭她自己的努力，做到中国首位一身兼二任的女大使，即我国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大使。我们这对夫妇大使一度被媒体传为佳话。我能得到她作为我终身伴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们的蜜月之旅是在去罗马尼亚上任的途中，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上度过的。

我于1957年到驻印尼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在黄镇大使领导下工作了6年。

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

1974年我率中国代表团去委内瑞拉参加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并按国内指示同委方进行建交谈判。经过友好协商，我同委外交部政治司长冈萨雷斯顺利达成并签署了建交协议。回国后，我被中央任命为首任驻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大使。

委内瑞拉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盛产石油和富铁矿，首都加拉加斯的中心高楼林立，令人倾倒和赞赏，但首都周边贫民窟的状况令人心碎。当时，佩雷斯总统忙于石油国有化，未及访华我即离任了。

中委相距遥远，建交较晚，相互了解不深。建交初期，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尚有疑惧，不仅迟迟不派大使，而且对我馆人数有所限制。在我建馆第一年，就曾发生三件蹊跷的事：一次是半夜有人越墙进入馆内，自称是委共，遭政府迫害，要求政治避难；第二次是大学生白天来访，标榜思想进步，要求去中国；第三次是有人说被追捕，要求在使馆躲藏。上述三人均被我立即劝回。作为首任大使，深感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多做友好工作，细水长流，不要急于求成，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不输出革命，求同存异，逐步增进了解和信任，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到了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查韦斯就任总统后，大力推行对华友好政策。由于我国经济大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猛增，委内瑞拉已成为我国在拉美的很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

2000年初，查韦斯总统访华，委内瑞拉驻华大使邀请我和几位前任大使到馆参加宴会并留影。查韦斯主张玻利瓦尔式的社会主义，是拉美杰出的国家领导人。我为在委内瑞拉这个遥远的国家曾经工作过一段的历史而感到骄傲，也为自己发展中委友

好关系做过些努力而感荣幸。

“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

我从印尼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后，国际司的一些人起来造反，斗争矛头直指司领导。我对“文革”很不理解，遭到造反派开会和大字报批判。

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到外交部召开司长级以上干部会议，他对一些大字报说他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表示不满。结果，不久之后，《红旗》杂志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外交部的造反派马上给我们戴上“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这时大批的驻外大使被调回国，实际是为了批斗。造反派趁机推出了“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换掉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加上“四人帮”在1967年1月搞的“上海夺权风暴”，外事口，特别是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更加嚣张了。

虽然周总理挺身而出，保护在人民大会堂开万人大会受批判的陈毅，并提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但是随着“二月逆流”的爆发和社会上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外交部的运动于8月达到高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8月7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权，最后导致极左派公然踢开部党委，夺取了外交部的业务和领导权，使外交部大权旁落一个多月。最严重的事件是火烧英国代办处。后因毛主席对此提出批评，外交部的形势才有所好转。

1968年初，外交部的一些大使、参赞（包括我），贴出91人大字报，保陈毅，批极左。但当权派们仍然受批判、被罚站。1973年底，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批判矛头实际指向周总理。外交部在小范围内也批了周恩来的“三降一灭”。在1975年，外交部掀起了批邓小平的高潮，我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我心里为极左的再起是十分担忧的。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这场噩梦终于过去了。

亲历新中国外交大突破

当我在欧美司工作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举行，中国派团参加比赛。

这是“文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由于“文革”头几年的狂热和过火行为略有收敛，各行各业都希望开展一些正常的对外交往，体育部门涉及意识形态色彩较少，开展对外活动也比较容易。我所在的欧美司负责国际组织事务，得知名古屋乒乓球赛时美国球员向我团示好，并提出访华愿望。我司立即将情况上报中央。次日早上，中央决定邀请美国等五个团访华。我当时作为外交部代表，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名义，参加以国家体委为主组成的小组，接待美国球队。

在参加接待工作第一天，就遇到个棘手问题。我到机场接代表团时，突然发现机场大厅悬挂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大幅标语。我立即觉得，美团下飞机后，很可能认为这是为他们来访而挂的。时间紧迫，权衡轻重，我只好鼓起勇气，承担责任，提出撤下这一标语。幸好得到在场的体委负责人的理解和机场人员的配合，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中央对这次接待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抓，并指定黄华、章文晋领导的小组具体掌握。中美双方的球员友好接触，为中美人民的友谊和理解开创了美好的先例。这样，中美之间的坚冰从民间交往开始打破，之后迎来了官方关系的正常化，“小球推动了大球”，震动了世界。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63年，我从印尼奉调回国，到国际司任副司长。司长龚普生是我燕大的校友，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革命，曾受党的派遣到美国做抗日宣传的工作，是党内唯一在解放前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干部，英文纯熟。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声明后，一直到1971年共经历了21年的时间。支持中国的国家从50年代初即提出提案，要求联合国恢复我合法席位。

尽管美国提出恢复我合法席位问题是重大问题，要有2/3可决票才能通过，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支持中国的国家

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阵容和主力，加上1971年7月中美关于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公告的发布，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超过2/3多数的可决票（即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比例）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8年我离开委内瑞拉回国就任国际条法司司长，这样又从双边外交回到了多边外交的岗位。1980年，我奉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根据我的观察，“三D”始终是联合国工作的主旋律，即非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裁军（Disarmament）和发展（Development）。这三个问题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而不是超级大国或西方列强所关注的。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就是联合国本身具有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决议的权威性、议题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巨大性、行为的规范性及国际交流的频繁性等方面。联合国的决议往往不尽如人意，但决议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某种约束力。搞得不好，也会陷入被动，使国家利益受损。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虽然没有执行约束力，但有政治上、道义上的影响力，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有执行力、约束力的。因此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联合国的工作，派最强的干部任常驻官员。

1978年之后，除继续坚持反霸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外，我国逐步打破过去很多禁区，中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事业和活动。甚至连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人权委员会，我们也在1979年开始成为观察员，1981年正式参加，参加时确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积极慎重，循序渐进，趋利避害”。这个方针实际上也代表了我们在很多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原则。这样，经过多年的努力，联合国工作局面逐步打开。到了1985年我们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活动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多边外交领域，参加了共383个国际组织，并陆续批准了132项公约。在多边经济、技术和智力合作方面，我国根据“有取有予”的原则，获得了7亿多美元的无偿技术援助（包括

难民署5000多万美元的援助），近1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特别是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料，如通过教科文组织获得1903年至1981年有关我国海区的各种海洋资料，通过科技考察获得双边渠道难以获得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有关技术。

关于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

我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五年期间，几乎天天到安理会出席会议或进行非正式磋商。我曾担任四次安理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联合国组织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为联合国确定了大国一致原则，赋予战胜的五大国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由他们拥有否决权利，这否决权既是一种特权，也是委予他们对国际和平负有的重大责任。

否决权关系到世界大局和国家形象，使用时，自然应当十分慎重。1945年到2005年，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总共使用257次否决权。其中，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中国5次（新中国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只使用了5次）。1946年到1965年间，苏联曾106次投下反对票。冷战后时代，各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大为减少，1990年至2005年，安理会共出现18次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其间，俄罗斯只使用了3次，甚至有6年没有出现过一次否决票。否决权次数的锐减反映了在国际较量中，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减弱，各国间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虽仍尖锐，但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间妥协和协调的空间与余地也在变大。

1971年至2007年底，新中国使用的5次否决权，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支持发展中国家。1972年8月，反对联合国接纳孟加拉国为联合国成员国（因联大和安理会有关印巴战争决议尚未得到实施）；1972年9月，为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否决西方修正案；1997年1月，反对关于向危地马拉派军事观察员问题；1999年1月，反对关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延常驻守在马其顿期限的决议案。后两项都是因为危地马拉和马其顿与台湾有“邦交”。2007年1月，中国又根据我们一贯主张的不干涉他

国内政的立场，投票反对美国提出的谴责缅甸的提案。至于在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多次投了反对票，但这是秘密投票，不列入记录，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议事规则规定，不算行使否决权。中国行使否决权的记录，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的积极力量。

恢复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恢复新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席位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经过多年封闭环境后，终于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趋利避害”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

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参加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是在政治领域的一次突破，那么，在经济领域的突破，就是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了。

这两个组织是联合国最初成立时就设立的专门机构，在国际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银行是联合国在资金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以稳定各国货币汇率、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为目的。两个机构是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的。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根据经济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特别提款权，而世界银行的理事分配名额又根据各国所缴特别提款权的多少来决定，因此两个机构的领导权当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美国又是最大头。与世界银行相关联的还有后来设立的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的成立是以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为目的的。加入世界银行就意味着参加所有这四个金融机构的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大家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都想把经济快点搞上去，但资金从哪里来？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才 2165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 226 美元，属低水平国家行列。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上，要想取得迅速发展，光靠自力更生能做得好吗？这时，人们很容易想到，只要有可能、无大害，就应该尽量争取些外援，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不矛盾。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视参加世

界银行问题，自然摆上了议事日程。

为了接待秘密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代表团，经中央批准，由外交部、财政部、中国银行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在 1979 年 5 月至 6 月间先后同上述两个国家的代表团谈判。代表外交部参加这次谈判的是时任国际条法司副司长的何理良。

参加世行除了政治上驱逐蒋帮代表，恢复我合法权利外，在经济层面上，有利之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参加后可以取得大数额的项目贷款，是利用外资的一条比较有利的渠道。世界银行的长期贷款利率，参照国际市场利率，但更有优点：（1）期限长，可到 15—20 年；（2）利率固定；（3）贷款杂费少，只有手续费 0.75%；（4）利用贷款购置的技术设备采取国际招标、现汇购买方法，借款国可选择价格便宜、质量先进的技术设备；（5）在国际招标中，本国企业也可以参加投标，并有机会优先争取得标，这样，就可为本国节约外汇。为了照顾国民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给予的贷款条件更特别优惠，期限可长达 50 年，不计利息，只收 0.75% 手续费，头 10 年可不必还本，第二个 10 年，每年还本 1%，其余 30 年，每年还本 3%。

第二，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和管理水平。

第三，当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参加了这两个国际组织，我国参加后，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诉求和利益。

第四，参加后有利于中国出口。

为了发展与世行领导层的关系，促进恢复席位问题的顺利解决，1980 年 6 月，我国邀请了世行行长、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访华，并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邓小平和谷牧副总理都会见了，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见。

麦克纳马拉先生虽然在越南战争时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但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看问题客观，没有多少成见。当邓小平表示“中国还很落后”时，麦克纳马拉则指出：“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是 68 岁……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仍然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在扫盲、保证人民营养水平方面取得进步，令人赞叹。”“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一个在思想、文化、社会方面发展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可以说穷，

但并不落后。”

邓小平和谷牧会见麦克纳马拉的气氛是友好的。邓小平着重就世界政治、战略格局和中美苏三角关系谈了看法，并且强调：“中国发展起来，对世界局势的稳定不说是有很大作用，也有相当重要性。有人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对世界起坏影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邓小平重申：“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凡是搞霸权主义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即使我们发达起来后，仍然属于第三世界。”麦克纳马拉则承诺：“十年内，世界银行将会成为中国取得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最大来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失职了。”

这样，经过必要的手续后，1980年的4、5月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它的附属金融机构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都先后恢复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在接受国际政府性贷款援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1981年世行对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支持大学发展项目以来，截至2005年6月30日，世行对中国贷款的总承诺额，已累积近391亿美元，共支持了263个发展项目。2005—2006年期间，预计贷款总额将在29亿美元左右，使中国跻身于取得项目贷款最多的世行借款国行列。

1978年，为加强对联合国的经济联系，我国同意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并在我国设立第一个办事处。

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进行多边技术合作的主要机构，也是全球最大的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同时，又是联合国促进发展活动的中央协调组织。它的宗旨是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援助。但它和世界银行不同，世界银行以提供大额长期项目为主，而开发署则侧重于向受援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其中70%是无偿的，30%是无息贷款；业务方面是提供专家服务、资助受援国项目人员出国培训和专业考察等；至于硬件，如仪器和设备，只能提供必需的示范性项目。它提供援助资金的80%被指定用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9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而其中的60%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为了加强受援国自己执行和管理受援项目的的能力，开发署推行了受援国政府执行项目。当前，由受援国政府执行项目的比例已达70%，中国为100%。

1979年上半年，经外经贸部、外交部、财政部共同协商，呈报中央批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于1979年下半年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接待工作，由外经贸部抓总。开发计划署的首任代表美国人夏龙，在1979年8月28日正式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何英递交了委任书。这样，开发计划署就在中国正式敲锣打鼓“开张营业”了。

自1979年以后，中国加强了同开发署的合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向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面临缺乏信息、渠道和资金的问题。开发署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国解决了这方面的困难。如帮助我国建设第一家为公众服务的计算机中心，并引进了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美国对我国禁运，但开发署却帮我国引进了），该机每秒运算200万次。运算速度每秒200万次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当时，却是不小的数字。此外，开发署还帮助中央气象局引进了卫星气象预报技术，培训了一批卫星气象预报技术人员，为我国卫星气象预报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又帮助我们引进遥感技术及其在农业、地质勘探、自然灾害监测等领域的应用技术，培训了一批技术人才，为我国遥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也可由发展中国家人担任

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主张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应实行在五大洲国家间轮流连任制。重要的是：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历史性胜利。

联合国秘书长权力很大。每五年一个任期。根据惯例，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担任，因为他们的国力强大，而且有否决权。秘书长这个职位，长期来一直由西方发达的小国占据着。

1981年，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博士在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后，仍想继续担任该职，故出面竞选。这引起许多国家的非议。同时竞选的有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他是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萨利姆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干的非洲政治家，在非洲国家中威信很高。在去联合国工作前，曾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多年，对中国十分友好。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时候，就是萨利姆高兴地在会场带头跳起舞来的。离开联合国岗位后，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萨利姆回国任坦桑尼亚外长、总理，后来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确实是一位在非洲很有影响的人物。

经过反复衡量，我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联合国秘书长的岗位，已连续 24 年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有，难道发展中国家的人物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应站出来说话。怀着这样的认识，我就大胆设想：应反对某人的第三次任职，得到外交部的批准。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一否到底”的指示。

11 月 17 日，安理会连续举行了八次投票。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因中国和美国投了反对票，都吃了“红牌”。

12 月 3 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五天后的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到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身上。

12 月 11 日，在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通尼大使主持下，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 17 轮投票。我和梁于藩以及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一起参加了这次具有不寻常意义的投票。结果，德奎利亚尔获得了 10 票赞成票，因无否决票而荣幸当选。

12 月 25 日上午，第 36 届联合国大会在基塔尼主席主持下，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德奎利亚尔表示真诚祝贺。亚非拉地区国家代表也纷纷指出，新的秘书长的产生，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他们纷纷赞扬中国在选举中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立场。联合国总部警察很多都是黑人，他们虽是美籍，但仍都不忘祖先——黑非洲。当我从安理会大厅走出时，不少黑人警察都向我竖起大拇指：选举是不记名的投票，但人人知道，这场选举风浪是中国的正义行动造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中国外交的光彩照人之处。

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就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德奎利亚尔离任后，是埃及的加利，接下来是加纳的安南，现在又已轮到韩国的潘基文了。亚洲之后可能再回到欧洲。世界各大洲都有份，而且不超过两届。

邓小平“绝不当头”的思想同不称霸方针是紧

密关联的。他在不同时期强调这一点，又有它的针对性。1982 年，新当选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邓小平同他会见。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前述特殊背景，德奎利亚尔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邓小平一再表示不同意此议。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邓小平讲话时，那种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使对方感到中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发展中国家，又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冷战后时期，邓小平再次强调“绝不当头”的思想，这又是从另一种国际环境下提出的重要政治考虑，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的，值得我们每个外事工作者认真学习和领会。

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我国的外交之所以取得重大的成果，多得益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例如，他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构想，确实是极其明智的。这一构想既保持了香港、澳门的稳定，又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洗刷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的不可动摇的立场是：

《南京条约》是在中国人民无权的状态下签订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之不予承认，坚持要求香港应同九龙和新界一起回归祖国。1982 年 8 月，邓小平曾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是一点儿都不能谈的，连半点儿也不能谈。”中国政府采用了讲道理的态度同英政府谈判解决香港回归问题，避免诉诸武力，这是对双方有利的和平举措。中国打消了英国的种种幻想和借口，在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对香港的基本法，1997 年 6 月 30 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香港主权和行政权交还给中国政府的仪式，英国国旗降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升起来了。终于，百年国耻，一朝洗雪。

历史竟然如此巧合。林则徐当年为丢失香港而

悲愤填膺，而他的玄孙却在联合国宣告：中国收回香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终于崛起了。

本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是在中英两国政府之间进行的，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名单中列有香港和澳门，两地有被英葡使之独立的危险。因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建议，应当将香港、澳门从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名单中删除。否则，肯定会为日后的中英谈判增添不少麻烦。经过我代表团和各驻外使馆的工作，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197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赞成和5票（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南非）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将香港、澳门从非殖民化委员会名单上删除，在国际法律上增加了中国对香港、澳门地区的主权的国际认可，为日后进行中英、中葡谈判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既然香港问题的解决同联合国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递交给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门登记呢？之所以这样做，原来是英国政府建议的，中国政府予以同意。

英国要求这样做的原因，估计可能是：英国不相信中国在收回香港主权后会实行50年的“一国两制”。若是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一登记，就等于到联合国大肆宣传，约束中国，使之不能违约。另一方面，也可使国际社会了解，英国不是无条件地撤出，香港有机会保留其大部分的独特性。

中国政府同意英国的建议，是因为这可说明，中国对实施一国两制是诚心诚意的。

想不到这本来不是一个什么外交大行动的举动却发生在林则徐的后裔和英国政府的代表之间，给这个事件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一百多年前，当因为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而导致香港割让英国后，林则徐曾经气愤不平，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而一百多年后，他的第五代孙凌青却终于可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不是历史学家，但相信中国历史虽然悠久，类似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事情恐怕也是千载难逢的。

历史的瞬间虽然只有一刹那，却凝结了几代中国人血泪交织的斗争成果。一位外国名人曾经指出：

“这一百多年，世界是一个大屠杀场，而中国则是这个屠杀场的中心。”我想，外国人之所以把中国说成是“中心”，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国是世界列强争夺的战场，而不是只受着一国的殖民统治；也因为这一百多年，被屠杀的中国人恐怕也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多的。的确，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但中国人的血没有自流，在经过艰苦曲折的长期斗争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光明。我深深地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登记于1985年纽约时间6月12日上午举行。登记那一天的天气非常晴朗，风和日丽，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我奉命在这一天约好英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汤姆森大使，一起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我和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黄嘉华大使、随员刘振民（现已升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来到联合国，登上联合国大厦那座可以直达第38层顶层的电梯。电梯门打开时，法律事务部的官员已在迎候。

不大的法律事务部办公室里，竖着联合国的旗帜，显示出这个组织的法律权威。副秘书长办公桌两边分别插有中、英两国国旗。福莱施豪尔副秘书长（联邦德国人）与我和汤姆森大使一一握手，我与汤姆森大使也互相微笑握手致意。然后，我们一起将中英联合声明的中英文文本递交给福莱施豪尔副秘书长，并一起摄影留念。当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实际上我是用微笑来掩盖一种发狂似的喜悦，因为在外交场合，不允许外交官有超越寻常礼仪的表现，只好浅笑即止。福莱施豪尔博士在仪式结束后对我说：“联合国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还是第一次，而举行如此庄严的仪式，更增添了光彩。”我对福莱施豪尔博士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指林则徐），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也欺辱不了我们。”

记得在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喜讯传来，我心潮澎湃，曾经赋《七律》一首。仪式完成后，我回到家里，又把这首诗拿出来重温：

七律

中华儿女志弥坚，昂首虎门销毒烟。
勇斗百年涤旧耻，腾飞万里谱新篇。
河山昔日悲焦土，大地今朝喜换颜。
高祖有灵惊不识，笑询天上抑人间。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前，很多报纸、杂志因为我是林则徐后裔，又让我写诗纪念，我根据上次所写内容，改成诗、词各一首，思维和内容相似，重点当然放在香港已经正式回归上了。

七绝

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九易英徽。

家恨国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浪淘沙

赤胆照千秋，图解国忧。

乌云滚滚北风道。

空有雄心驱虎豹，壮志难酬。

巨变撼寰球，崛起神州。

京都决策有宏猷。

闻报明珠归故主，喜泪飞流。

《浪淘沙》上阕讲了林则徐的胸怀和处境，下阕则讲的现在。

登记行动给我在联合国的使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登记后不到一个月，我就离任回国了。

一点体会：运用外语能力

作为66年前在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的一名校友，我深深体会，母校的教诲和引导是多么宝贵。我感到，在联合国工作必须具有一定外语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外交部使用干部，注重革命资历、政治可靠。因此，调了不少老革命来部工作，这是对的，但到联合国工作和参加多边会议不懂外语必然十分困难。

联合国的正式会议虽有同声传译，但有很多小组会不可能有同声传译，即使在有同声传译时，传译能否准确也是问题。即使准确译出，时间能否及时合拍，使得你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更是难说。至于平常的交际活动，自己能掌握外语也方便得多，特别是大型或重要宴会，对方不可能请翻译参加，不懂外语就要成聋子了。因此，代表必须自己能说外语，而且要有相当高的水平，这和搞双边外交可以依赖翻译不一样。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相当高的水平”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和外国人一样好，并且只限于政治外交领域的外文，而文学、科技、日常俗语等，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都好。而且，外语有多种，我所说的主要指英语，因为它是工作语言，是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驻联合国外交官都懂的一种语言。其他语言不懂，倒也无大碍。

2007年12月

（本文摘自《延河畔的外文学子们》一书，本文由张联摘自凌青著《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一书）

赴萨摩亚建馆的日子

陈文照



作者简介：

陈文照，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1960 级校友。1965 年毕业后分配至高等教育部外语教育司，1971 年调入外交部。曾任我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著作有《新西兰》、《吴音柔媚醉天涯》和《枫雪桑梓情》。

西萨摩亚（现名萨摩亚）为热带岛国，约 2934 平方公里，18.5 万人口，属波利尼西亚人种。由于它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心，素有“波利尼西亚心脏”之称。西萨摩亚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萨摩亚人 3 千年前已在此定居，约 1 千年前，萨摩亚王朝被邻近岛国汤加王国所征服。公元 1250 年，萨摩亚的马列托亚家族赶走了汤加入侵者，恢复了萨摩亚王朝统治。因此，马列托亚家族在萨摩亚享有崇高威望。洎乎近世，英、美、德相继入侵，萨摩亚遂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萨摩亚由美国治理至今，西萨摩亚于 1962 年 1 月 1 日获得独立。1997 年 7 月，经议会批准，元首签署，西萨摩亚独立国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因其赫赫功勋，成为国家终身元首。2007 年 5 月 11 日，马列托亚逝世，享年 94 岁。

建馆先遣组

1975 年 11 月 6 日，中国与西萨摩亚建交。它是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国中第二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是斐济，比它早一天。1976 年 9 月，马列托亚元首殿下正式访华，受到隆重接待。他下榻钓鱼

台国宾馆。我国领导人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元首殿下深受感动。更令他感动的是，我国政府执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他这个小岛国的元首能和 10 亿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平起平坐。这是他过去出访中未曾遇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列托亚元首访华前 1 个月，外交部成立了赴西萨摩亚建馆筹备小组：有汪滔临时代办，3 位外文干部，机要员、厨师、司机、公务员，一共 8 人，我也在其中。建馆工作比较繁杂，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编制计划，采购物品。如办公用品、桌椅书柜、厨房炊具、图书报刊等；二是学习文件，去地区业务司看材料；三是置装。那时出国，分热带、温带、寒带三类，分别发给不同标准的置装费。热带最少，寒带最多，温带居中（现在情况不同，没有置装费了）。规定每人要做中山装、西装、大衣等。出国人员置装购物有专门商店，如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和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凭干部司介绍信，可在此做衣，一周后试装。

我们一行 8 人于国庆节后起程，取道香港，亚洲旅行社叶先生接送，入住新华社香港分社招待所。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这是一幢6层小洋房，面对蔚蓝大海，环境优美。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搭乘英国航空公司班机飞悉尼，到了启德机场才得知飞机晚点5小时。英航表示，可为我们改签泛美航空的班机去悉尼，我们婉拒了，又回到招待所休息。凌晨时刻，英航飞机到港，我们顺利登机，经过8个多小时飞行抵达悉尼。因为误点5小时，没能赶上原计划在悉尼转乘的快达航空公司的班机，只得在悉尼过夜，我和机要员同一房间，因带有机要文件，我俩轮流休息，把外交邮袋放在枕边，如同战士枕戈待旦，不敢合眼。翌日，再由悉尼搭机，经过4小时飞行，到达斐济的楠迪。驻斐济使馆临时代办张英和江承宗来接机，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休息二天，转乘波利尼西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飞行1个半小时抵达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受到西萨摩亚外交部秘书长托玛的热情欢迎。萨摩亚姑娘给汪代办献上玉兰花编的花环，香气四溢，几天来的一路劳累，顿感消失。

我们临时住在国营图锡塔拉旅馆，这里设备齐全，十分舒适。整个建筑是萨摩亚式的圆穹形凉亭，造型别致。说起这旅馆的名字，还有一个历史掌故。萨摩亚语中“图锡塔拉”意为“讲故事”，“写小说”的人。这个讲故事写小说的人就是19世纪英国作家斯蒂文森。他以著名小说《金银岛》蜚声文坛。1889年斯蒂文森因健康恶化，迁居萨摩亚养病，期间，他以岛上居民的生活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集《岛上夜谭》。1894年12月3日，斯蒂文森突患中风逝世，葬于岛上。我在西萨摩亚时曾寻访斯的墓地，那是一处不显眼的山岗，墓前摆放着一束鲜花，说明常有人来祭拜。萨摩亚人尊敬斯蒂文森，故将阿皮亚最好的旅馆命名为“图锡塔拉”。旅馆门厅内，挂着斯蒂文森画像。

我们到达后的第三天，马列托亚元首通过秘书向我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令人惊喜的是，元首邀请我们全体馆员赴宴。宴会在元首府举行，元首特地请了一位中国妇女掌勺（那时西萨摩亚仅有10余华人，无中餐馆），做了油焖大虾、素炒青菜、什锦炒饭等比较地道的中国餐。受到元首如此款待，我们深感荣幸；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为了体现中国人礼尚往来的待客之道，我们诚邀元首殿下到使馆作客，元首欣然接受。

宴请元首

为了尽快开展对外活动，我们租了一家小旅店作为中国大使馆馆舍，条件简陋，被我们戏称为“大车店”。我们8人很快搬进“新居”，进行内部布置。然后，邀请马列托亚元首来使馆做客，当然，在这里接待元首，困难之多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没有像样的会客厅，其次是没有放映室（为了多做工作，决定为元首放纪录片），再次是没有做中餐的厨房。没有宴会厅，我们就利用现有的几扇屏风，把一间大厅隔开，一边摆上圆桌、权当宴会厅，另一半摆上沙发，作临时会客室，元首一到先在会客室休憩品茶。这个小旅店只有这么一间大厅，现在一分为二全用上了，再要找放映室实在太难了。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给元首放映的是一部16毫米的纪录片，机器小，放在一张方桌上即可，电影屏幕也小，一平方米左右。于是，把会客室又作放映室，待宴会开始后，把放影机和屏幕架好，宴会一结束，元首到会客室喝茶，同时也看电影，一举两得。

使馆的厨师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师傅，曾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多年。听说要宴请元首，感到责任重大。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烹调中餐所需的佐料和食品从香港采购，还未到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宴请元首是十分严肃的事，就是“无米”也要做饭啊。好在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有，虽然不是地道的中国货。又通过西萨摩亚外交部搞到一罐煤气，这为做中餐提供了方便。根据当地能买到的食品，厨师开了一个菜单：六冷盘、芙蓉汤、清蒸鱼、香酥鸡、烧扒蹄、素面筋、青菜心、点心水果。其中的面筋当然不是闻名遐迩的无锡面筋，而是厨师自己做的“土面筋”。他先把面粉浸湿，掏去麸子，再入油锅炸，很费时间，尤其是油炸这道工序，火旺了，面筋发焦，火温了，面筋发不圆。厨师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弄好。再说点心，也是厨师自己做的，很有水平。老实说，如果是在老使馆，做这些东西是很平常的，不算啥。而在新使馆，要啥没啥的情况下，就不易了。因为师傅一人忙不过来，我也常去帮厨，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会了几道菜，回家后竟然露了一手。

元首如约，正点来到使馆（我在这里强调正点，因为西萨摩亚人迟到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我们8条汉子，按事先分工，全部上阵。此时公务员上茶倒水，我则协助检查投影机与影片，司机负责使馆安全，在院子里转悠。

临时代办和翻译接待元首,每人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宴会开始,元首入席。乘他们品尝冷盘之际,我们很快把临时会客室布置成临时放映室了。然后,我再入席,向元首微微一笑,表示歉意。汪代办即向元首解释,为了请元首宴会后看电影,他刚刚在隔壁把放映机安置好。这里条件简陋,还请元首殿下鉴谅。元首点头,称这样很好很好,话题又转到中国烹饪。元首问:芙蓉汤是怎么做的?芙蓉乃蛋清做的,形似一朵朵白花,故取此美名。下面每上一道菜,元首都细细品尝,还要问如何制作,我们就把厨师请来给元首讲,元首听得认真、特别是讲到用当地出产的东西做的食品时,元首兴趣很浓。宴会结束时,他还特地到厨房与厨师握手。

下来就是看电影了。虽然是纪录片,我们还是先把内容给元首介绍一下。因为其中有些工艺美术的片段,如苏州双面绣、黄杨木雕、青田石刻等,把大致情况说一说,元首就容易看懂了。有些名胜古迹,特别是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元首看得倍觉亲切,因为他访华时参观过这些地方。20多分钟的纪录山,很快放完了,元首热情鼓掌,以示感谢。此时,公务员已是满头大汗,一方面是西萨摩亚天气炎热,此间又无空调,另一方面是心情紧张,初次给元首放电影,唯恐机器出问题,中途停机。由于准备充分,整个活动进行顺利,大家为此而高兴。

丹麦绿色发展模式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节约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车巍



作者简介：

车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1978 级校友，专修泰英双语专业。耶鲁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1983 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外交部和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工作。曾在纽约 Parson & Whitmore 公司、BSMG 和 Strategy XXI 国际传播咨询公司负责中国市场工作。后回国在凯瑞安达国际传播咨询公司 (KREAB) 担任合伙人兼任北京办公室负责人。2010 年任丹麦最大的工业公司丹佛斯中国区副总裁。

随着中国经济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压力日趋严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成的经验少走弯路？通过研究和比较世界各国的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北欧国家不同程度地走在世界前列，丹麦表现尤其突出。以“零碳”为目标的“丹麦绿色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探寻能源供应和安全最为成功的“实验室”，充分证明了人类只要选对了正确的发展路径，完全有可能彻底打破能源瓶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而且，“丹麦绿色发展模式”的诸多最佳实践和具体作法，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可持续性城镇化和生态文明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丹麦绿色发展模式”的缘起及形成过程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丹麦 93% 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但 1973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后，油价涨幅达到 3 ~ 4 倍。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提价严重加大了丹麦国际收支赤字。受到两次能源危机重创之后，丹麦开始尝试改变过去依赖于传统能源的模式，在能源消费结构上，努力实现从“依赖型”向“自力型”转变。

其结果是：从 1980 年代至今，丹麦的经济累计增长 78%；能源消耗总量增长几乎是零；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降低了 13%，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脱钩，证明提高 GDP 和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意味着消耗更多能源。目前，丹麦已经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净出口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特别是风力发电和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应用，在欧盟成员国中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大量采用节能技术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丹麦在能源供应和温室气体减

排方面的各项指标普遍优于其他发达国家。目前，丹麦能源自给率是 156%，日本和美国分别为 18% 和 71%；丹麦人均能耗为 3.6 吨油当量，日本和美国分别为 4 吨和 7.7 吨。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丹麦为 10.4 吨，日本和美国分别为 9.4 和 19.7 吨。在此基础上，丹麦设定了新的目标：在 2050 年之前建立一个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并且不含核能的能源系统，这被称为丹麦的“第二次能源革命”。欧盟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20%，而丹麦已经提前在 2011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并计划在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 35%，使风力发电占全国总用电量的 50%（如今为 21%）。丹麦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量占本国出口总量的百分比在欧盟 15 国中位列第一。目前欧盟的能源政策的诸多参考依据，均源于丹麦。

二、“丹麦绿色发展模式”的五大关键要素

丹麦建设人类绿色能源“实验室”打造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大要素：

（一）政策先导

丹麦政府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丹麦政府认识到，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部门牵头主管能源非常必要。为此，丹麦能源署于 1976 年应运而生。该部门最初是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后来，该部门从国家利益高度出发，调动各方面资源，统筹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并组织监督实施，管理重点逐渐涵盖国内能源生产、能源供应和分销以及节能领域。始终坚持节能优先，积极开辟各种可再生能源，即“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原则，大力开发优质资源，引导能源消费方式及结构调整。值得一提是，政府遵从民意，因全民公投反对，放弃了最初准备开发核能的计划，从长计议，迅速厘清了以风能和生物质能等符合丹麦国情的新能源政策。在紧随成功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经济总量与能耗和碳排放脱钩之后，2008 年，丹麦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丹麦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为国家彻底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构建起无化石能源体系设计总体方案，并就如何实施制定路线图。

为了推动零碳经济，丹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例如利用财政补贴和价格激励，推动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包括对“绿色”用电和近海风电的定价优惠，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丹麦采用固定的风电价格，以保证风能投资者的利益，风能发电进入电网可采用优惠价格，在卖给消费者之前，国家对所有电能增加一个溢价，这样消费者买的电价都是统一的。另如，丹麦政府在建筑领域引入了“节能账户”的机制。所谓节能账户，就是建筑所有者每年向节能账户支付一笔资金，金额根据建筑能效标准乘以取暖面积计算，分为几个等级，如达到最优等级则不必支付资金。经过能效改造的建筑可重新评级，作为减少或免除向节能账户支付资金的依据。

（二）立法护航

在丹麦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从立法入手，通过经济调控和税收政策来实现的，成为欧盟第一个真正进行绿色税收改革的国家。自 1993 年通过环境税收改革的决议以来，丹麦逐渐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水、垃圾、废水、塑料袋等 16 种税收的环境税体制，而能源税的具体举措则包括从 2008 年开始提高现有的二氧化碳税和从 2010 年开始实施新的氮氧化物税标准。

在各税种中，丹麦对化石能源的课税最高。例如电费就包含高达 57% 的税额，如果用户不采取节能方式，就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再以丹麦的汽车购置使用税为例，消费者需要支付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和牌照注册费，税费加起来约相当于汽车价格的 200%，因此丹麦小汽车的价格比其他欧盟国家高出两倍。同时，能源税包括从 2008 年开始提高原来的二氧化碳税并从 2010 年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氮氧化物税标准。另一方面，丹麦政府对于节能环保的产业与行为进行税收减免。例如，为了鼓励对风电的投资，丹麦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对风机发电所得的收入一直没有征税。在运输领域，对电动汽车则实行免税。并要求生物燃料的使用必须占运输燃料消耗到 2020 年要达到欧盟制定的目标 10%。这种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对排碳量少的新能源收税低，促使更多人自觉通过经济调节，选择价格和污染相对较低的能源。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出台有利于自行车出行的

彩笺挥翰 WORKS OF ALUMNI

道路安全与公交接轨等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自行车成为包括王室人员及政府高官在内多数民众日常出行的首选。如今，全国人口 550 万自行车拥有量超过 420 万辆，人均拥有量为 0.83 辆（我国为 0.32 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三）公私合作（PPP）

丹麦绿色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公私部门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有效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绿色大型项目时，在商业中融合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这种公私合作可以有效促进领先企业、投资人和公共组织在绿色经济增长中取长补短，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丹麦南部森讷堡地区的“零碳项目”便是公私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技术创新

丹麦是资源较为贫乏小国，而且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因此，丹麦政府和国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发展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个动因是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全球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日高，也给丹麦企业界和研究界提供了动力和商机，把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减排温室气体最有效手段。近年来，能源科技已成为丹麦政府的重点公共研发投入领域。通过制定《能源科技研发和示范规划》，确保对能源的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以最终将成本较高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向市场。此外，丹麦绿色发展模式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立法税收的引领下，新的能源政策始终强调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工业界积极参与，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技术创新，催生出一个巨大的绿色产业。通过多年努力，丹麦已经掌握许多与减排温室气体相关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使丹麦的绿色技术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丹麦成为欧盟国家中绿色技术的最大输出国。归纳起来，技术创新尝试主要集中在“节流”和“开源”两大方面：

“节流”：大力推广集中供热，发展建筑节能技术。丹麦地处北欧，采暖期长，很多建筑一年四季需要供热。因此，丹麦积极发展以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亦称“区域供热”）为核心的建筑节能技术。如今丹麦超过 60% 的建筑采用集中供热技术，通过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大量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行集中供热，包括沼气集中供热、秸秆及混合燃烧

集中供热等。目前，可再生能源在丹麦的热力供应中的比重已经稳居首位，超过了天然气和煤炭。

在低碳建筑，丹麦建立了严格的建筑标准，大力推广节能建筑。丹麦建筑节能的主要措施是：要求开发商提供节能建筑标识，按照能耗高低将建筑分类分级管理，使用户根据需要选择；简化节能检测方法，重视和监管好门窗和墙壁的保温效能，使得开发商无法偷工减料，确保节能效果；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补助，如窗户改换、外墙保暖可以得到政府财政补贴。丹麦通过大力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和对建筑设施能耗实行分类管理，大大降低了建筑能耗。与 1972 年相比，丹麦的建筑供热面积增长了 50%，而相应的能源消耗却减少了 20%，相当于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降低了 70%。

集中供热和低碳建筑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丹佛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33 年在丹麦南部的森讷堡创建的丹佛斯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在全球各地均有工厂和公司遍布，业务领域涵盖暖通空调、建筑节能、变频器和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大大提高了现代生活的舒适度，推动了环保和清洁能源的发展。作为创新企业的代表，在上述丹麦绿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开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独领风电世界潮流。自 1980 年开始，丹麦根据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风能和生物质能源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在目前世界累计安装的风电机组中，60% 以上产自丹麦，占世界风机贸易近 70%。丹麦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利用生物质能源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2005 年，丹麦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 30%，提前 5 年完成欧盟提出的 2010 年达到 29% 的目标。

此外，丹麦推动欧盟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通过德国、波兰等与欧洲北部电网相连，试图将海上风电输送到欧洲。这一计划得到欧盟支持，已经列入欧盟支持海上风电发展的示范项目。为此，丹麦争取在 2020 年将海上风电发展目标从目前的 30 万千瓦，提高到 300 万千瓦，并开始向北欧电网大量供应风电。

目前，维斯塔斯和国家能源公司（DONG Energy）是世界少数真正掌握了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和拥有运行经验的企业。他们在开发丹麦西兰岛海上风电场时就已合作，维斯塔斯为其提供价格低廉

的海上风机。通过近多年的实践，丹麦的在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和运行经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五）教育为本

丹麦今天的“零碳转型”的基础，与其一百多年前从农业立国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的基础一样，均是依靠丹麦特有的全民终生草根启蒙式的“平民教育”，通过创造全民精神“正能量”而达到物质“正能量”，从而完成向着更以人为本、更尊重自然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的“绿色升级”。上世纪 70-80 年代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以来，丹麦人不断反思，从最初对国家能源安全的焦虑，进而深入到可持续发展及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层级，关照到自然环境、经济增长、财政分配和社会负率等各方面因素，据此勾勒出丹麦的绿色发展战略，绘制出实现美好愿景的路线图，并贯彻到国民教育中，成为丹麦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三、结语

过去 40 年里，丹麦通过政策先导、立法护航、公私合作、技术创新、教育为本等关键要素，坚持“节流”优先与积极“开源”并举的原则，制定并执行了一套完整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战略和具体措施，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框架内，在财富创造、可持续发展、保障能源供给安全之间，形成了稳定平衡的三角形结构，实现了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良性发展，并继续向 2050 年全面建成“零碳社会”的目标稳步迈进。

丹麦作为北欧小国，国情与我国不可同日而语，但国内一些城市群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与丹麦有直接的可比性，而且丹麦 40 年前的传统能源结构与我国基本相似，都是以煤炭和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丹麦寻找解决能源问题根本出路所坚持的“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基本理念，实际上与我国的传统的商业智慧是相通的；在此过程中所不断加深强化的全民节约文化，与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丹麦过去数十年的转型，对于我国正在走向城镇化的部分城镇和地区有较大的可比性和实际的借鉴作用。如果将丹麦的成功做法和最佳实践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加以合理利用，将有助于我们加快建设一个生态文明节约型社会，并最终建成人、自然、社会共同和

谐发展的“美丽中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简报 2013 年第 48 期（总第 427 期））

岁杪晤在京北外校友感赋

姚作磊

作者简介：

姚作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 1967 届校友，曾在政府及企业任职（已退休），高级经济师。

现为深圳市长青诗社副社长兼《长青诗刊》副主编，香港诗词学会副会长。

繁英卸下浥轻寒，
又绽梅花一寸丹。
遥眺幽燕云水阔，
相嘘眉眼起居安。
千遭宴罢折冲酒，
四海波抟裨阖坛。
但以葵心酬旧梦，
春风何处倚栏干。

“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 捐赠倡议

兼容并蓄是母校拥有的世界眼光和开放胸怀，博学笃行是母校赋予师生的知行品质。为帮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特启动“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捐助困难学生工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涌泉助学金”筹资渠道为校友个人、校友企业及各类型校友团体、班级、年级等。助学金以在校生一年学费 6000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为单位进行筹集。助学金用于定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每人每年 6000 元（学费）或 12000 元（学费加生活费）。学校将对每一笔捐赠开具正式收据并在校友会网站（xyh.bfsu.edu.cn）上进行公布。

一、捐款方式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捐赠，校友可根据情况自愿选择：

1. 大学四年每年捐赠 6000 元人民币，或一次性捐赠 24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一名贫困学生的大学学费。

2. 大学四年每年捐赠 12000 元人民币，或一次性捐赠 48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一名贫困生四年的学费及生活费。

以上两种捐赠方式均为定额定向捐赠。校友可以进行一对一捐赠，也可以加入一对多捐赠，捐赠的校友个人或团体可以与被捐助学生进行互动。捐赠者均可在当年按照个人意愿对此捐款冠名，如“北外 XXX 校友（团体）涌泉助学金”。

二、捐款途径

1、现金捐赠

到学校校友办直接捐款，由基金会开具捐赠收据。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行政楼 7 层）

2、邮局汇款

汇 至：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周静收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 编：100089

【温馨提示】邮寄时请写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涌泉助学金捐赠。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

3、银行汇款

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名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账户账号：0200007609026407232

【温馨提示】汇款时请写明毕业年限、专业、班级、地址及联系方式并注明捐赠项目涌泉助学金捐赠。捐赠款到账后，校友办将及时寄送捐赠收据。

4、网上捐赠

母校教育基金会网站开通网上支付功能。使用网络捐赠功能，请登陆 jih.bfsu.edu.cn，点击右下“捐赠方式”，选择“网上捐赠”即可在引导页面的指导下填写信息，实现网上支付捐赠款。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 周静

电 话：010 - 88810192 传 真：010 - 88810192

邮 箱：bwxyh@bfsu.edu.cn

地 址：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办，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树木认养基金” 捐赠倡议

您想为自己的母校认养一棵树木，见证您在北外这段珍贵的记忆吗？那就让我们马上行动，一起参与到校园树木认养活动中来吧！

具体领养办法如下：

1. 认养主体

认养主体可以是校友班级、校友分会等集体形式，也可以是校友个人、校友夫妻、校友兄弟、校友父子、母子等形式。

2. 认养范围

主要包括校园内已经成活的树木，单株或数株。具体由后勤部门研究后划定，并向师生及校友发布。

3. 认养周期

每一个认养周期为五年，校友按周期进行认养。可以认养多个周期。

4 认养的费用标准

不同的树木所需费用不同，具体数额由校园管理中心确定。

5. 认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校友：认养树木的校友一次性缴纳认养树木费用。

在认养期间，校友享有树木的冠名权。

认养到期后，优先续订认养协议。

2) 学校：认养树木的养护由学校负责。

对认养树木进行冠名。学校校园管理中心对认养树木登记造册，并统一制作标牌，标明认养主体的个人姓名或集体名称、认养时间等信息。

科学管理和使用认养款，专款专用。认养款纳入到学校教育基金会专项管理，主要用于树木的维护养护、校园整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建设等。

6. 认养程序

1) 向校友办提出认养申请；

2) 校友办牵头，校友和校园管理中心协商确认认养树木；

3) 签订认养协议，明确权利和责任；

4) 开展相关的认养活动。

绿树认养承载着校友对母校的拳拳深情，通过绿树认养活动，不仅可以使母校的树木得到及时、周到的养护，同时还可以铭志于树，寄情于绿，留下一份永久的纪念。

联系电话：

010-88810192（校友办）

010-88816500（校园管理中心）

《北外人》征稿启事

亲爱的校友们：

为使《北外人》在选材范围、内容质量等方面有所拓展和提升，现面向广大校友诚征来稿、来函：

1. 文萃部分：欢迎提供自创作品，或推荐其他校友作品（已在其他刊物或网络上登载的亦可）。内容、体裁不限，篇幅 1000-3000 字左右，同时欢迎提供相关图片、照片；

2. 艺术作品部分：欢迎提供个人书画、摄影作品，或推荐其他校友作品；

3. 专访部分：人物专访是《北外人》的点睛之笔，欢迎推荐专访人物，并提供相关线索和信息；

4. 校友动态部分：欢迎提供校友聚会、校友参与重大事件、校友获得荣誉、职务变动等信息。

同时，期待校友们在阅读本刊的同时献计献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来稿请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0192/88816379/88810271

传真：010-88810192

电子信箱：bwxyh@bfsu.edu.cn



创始人：李沐蓉

李沐蓉，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998届校友，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硕士。在加拿大和中国有15年青少年教学经验，JA国际青年成就优秀志愿者。

沐蓉府，致力于以英语音乐剧表演的形式激发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和运用语言的思维能力，鼓励孩子全程参与音乐剧创作，系统学习声乐、台词、形体舞蹈、表演，启发孩子养成主动思考、主动表达和创新的习惯。在享受语言之美的同时，培养品格、审美和领导力。沐蓉府通过原创英语音乐剧表演打造高水平艺术团，多次在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舞台演出，助力青少年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

沐蓉府

CONTACT US
联系方式

158 2756 0223





北京外国语大学